

出版说明

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不破哲三于今年1月12日至2月18日在日共《赤旗报》上逐日发表了题为《斯大林与大国主义》的长文，8月份又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作为日共“指定学习文献”。

文章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了列宁生前同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思想所作的斗争，斯大林时期大国主义的种种表现，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恶性发展。作者认为，苏共领导的大国主义对内表现为歧视、压迫其他民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则表现为掠夺别国领土、粗暴地干涉以致控制别国、别党，直到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而这一切是同马列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原则根本不相容的，并且对当代世界和平和争取社会进步的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此外，作者也竭力宣扬了日共反对苏联党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

这篇长文在《赤旗报》发表后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为各方所关注。由于其中包含有大量的历史材料，而且从中可以了解日共在这一方面对苏联党的关系和态度，可以供我国有关的研究者参考，我们按照《赤旗报》全文汇编出版，对于文中某些我们不能同意的观点也未加删除，以便读者分析研究。

1982年6月



200008794

目 录

- 一 列宁六十年前的警告.....(1)
- 二 民族问题的“理论家”?(3)
- 三 二月革命时的混乱.....(6)
- 四 背离民族自决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9)
- 五 组成苏维埃联盟时的两个合并计划.....(12)
- 六 大俄罗斯人粗暴的“警察统治”.....(17)
- 七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20)
- 八 列宁最后的斗争(上).....(24)
- 九 列宁最后的斗争(下).....(27)
- 十 “遗嘱”得到遵守了吗?(31)
- 十一 大规模镇压与世界大战爆发.....(34)
- 十二 将德苏条约路线强加于人的大国主义.....(39)
- 十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与过.....(43)
- 十四 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恩格斯.....(47)
- 十五 对日作战留下的污点.....(52)
- 十六 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与大国主义.....(55)
- 十七 五〇年问题与斯大林.....(58)
- 十八 在霸权主义的“保护伞”下.....(62)
- 十九 斯大林之死及对他的批判.....(66)
- 二十 首先举起独立自主旗帜.....(69)

二十一	大国主义的攻击开始了·····	(73)
二十二	维护党的“主权”·····	(76)
二十三	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80)
二十四	为使干涉“合法化”要尽阴谋·····	(84)
二十五	军事集团是霸权主义的工具·····	(88)
二十六	塔拉基、阿明、卡尔迈勒·····	(92)
二十七	波兰政权的危机及其背景·····	(97)
二十八	背离民族独立的历史和传统·····	(100)
二十九	以“安全保障”为借口施加压力和进行干涉···	(104)
三十	秉承苏联旨意的军事政权·····	(107)
三十一	苏联垄断总编辑一职达二十四年之久·····	(111)
三十二	站在反党分子一边·····	(114)
三十三	蜕变成苏联对外路线的“宣传机构”·····	(118)
三十四	铲除大国主义的国际意义(上)·····	(122)
三十五	铲除大国主义的国际意义(下)·····	(126)

一 列宁六十年前的警告

继在阿富汗发生干涉战争之后，严冬时节在波兰强制实行的军事独裁再度以极其活生生的事实表明，始于斯大林的苏联大国主义给旨在谋求和平、民族自决和社会进步的国际事业造成了多么重大而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一点，通过千岛问题、1950年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当政时开始实行的干涉等问题，我们也有亲身体会。

这种既背离社会主义大义又违反世界民主主义原则的大国主义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特别是经斯大林系统地提出并发展到异乎寻常的规模之后，又被其接班人继承下来延续至今，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数十年之久的历史。

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列宁指出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是危及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重大祸害，并提出需要与之作决定性斗争，那是在1922年，距今恰好六十个年头。

从1922年5月起，列宁由于脑病发作，一直在哥尔克村疗养。他在疗养期间发现，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已膨胀到对社会主义和革命说来不可须臾置之不理的地步，于是立即展开斗争以便克服这种大国主义。他在这一年十月返回莫斯科之后继续进行这一斗争。列宁了解到，事态远比当初估计的要严重。他计划进行更加彻底的根除斯大林的大国主义的斗争，但由于病情不断加重，终于在第二年即1923年8月卧床不起，这

个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但是，列宁在此期间写下的一系列文章，对我们今天说来也具有极重要、极有价值的教导意义。

例如，1922年10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组成苏维埃联盟的问题时，列宁由于牙齿剧痛未能出席会议。他借自己牙痛为题进行发挥，特意写了下面一份“备忘录”送给政治局：

“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页）

还在同年12月底，列宁因病情第二次发作而躺倒在病榻上。他口述并让秘书记录下来的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揭发了斯大林借口“统一”社会主义各共和国，压迫苏联境内各民族并侵犯其权利的作法。列宁认为，要尊重各民族的权利，他断言，在社会主义各共和国的“统一”方面，即使发生了“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害”的情形，这种损害比起对斯大林大国主义放任不管，结果“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我们之后而在不久的将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4页）

列宁六十年前的这些话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的话对现在的大国主义者为干涉主义作辩护的论点，是恰如其份、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现在的大国主义者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说什么民族自决权从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要把对本国境外各民族的干涉行为正当化。列宁把这封信送交大会，也就是预定于1923年4月召开的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打算一旦康复就亲自出席大会，完成

这场斗争。但是，3月9日，也就是临近大会召开的一个月前，列宁第三次发病，一切政治活动都不能参加，结果使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不曾受到根本打击，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不仅如此，列宁最后一系列倾注心血的信件也被长期隐匿起来，我们是在斯大林死了数年之后才得知这些信件的内容的。概括说来，从列宁写这封信算起，实际上把它当作秘密文件封存隐瞒了三十多年之久。

今天，通过日本共产党本身多年的经验，通过世界政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使我们痛感到，列宁关于如果那时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仍旧放任不管，就必定给苏联社会主义乃至“共产国际”即整个国际斗争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的教导，是如何正确地预见了其后续事态的发展。

二 民族问题的“理论家”？

列宁在他一生中的最后阶段不得不宣布同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进行“决死战”，而列宁最初肯定斯大林也是在民族问题上。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斯大林1879年出生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1898年前后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他作为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干部坚持活动。据认为，斯大林第一次与列宁相见是1905年12月在芬兰塔默福斯召开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的时候。但是，他脱离高加索的活动开始参与党中央工作，是在1912年1月的所谓“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

因为他被补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当时，在高加索被捕、在警察监视下正在流放中的斯大林得知这一决定之后即逃离流放地，4月来到首都彼得堡（即今天的列宁格勒），开始担负编辑《真理报》等党中央的工作。

这期间，斯大林于1912年12月被召到列宁流亡的地点——波兰的克拉科夫，以便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与议会党团会议。1913年1月到2月他在克拉科夫逗留期间，在列宁的指导下完成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文的写作（后来，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因此才得到所谓民族问题专家的评价。

当时，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在不屈不挠地高举革命旗帜、对抗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主张解散地下党组织、只开展合法活动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之间展开的。这场论战的题目之一就是民族问题。

1912年8月，取消派召开了代表会议。会上，他们提出臭名昭著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暧昧口号，然后又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党的民族纲领加以种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把以民族自决权和各民族权利平等为中心的党的民族纲领阐述明白，就成为当时理论斗争的重要课题之一。

也许列宁注意到，来到克拉科夫的斯大林是俄国少数民族之一——格鲁吉亚族活动家，才要他执笔写有关民族问题的论文。列宁在1923年2月给高尔基的信中，把这件事通知了他：

“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

材料。我们对此也应该加把劲。”（《列宁全集》第35卷第71页）

这篇需要“我们”也“加把劲”完成的斯大林的文章，大致划分起来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论述民族定义和民族运动历史的一般理论，另一部分是维护民族自决权，并批判取消派及其“民族文化自治”，论述民族纲领。

列宁把这篇文章看作是阐述“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的文献之一，予以高度评价（《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列宁全集》第19卷第542—548页），但我认为，把这一评价扩展到前半部分、即一般理论部分，就是对列宁的评价作扩大化的解释。

在一般理论问题上，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最突出特点是从民族的定义出发。他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否定资本主义产生前有民族存在。斯大林的这个理论今天在一些人当中仍然是有影响的，什么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正确地说不是民族而是“民族体”、什么从真正意义上说日本民族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诞生的——这种议论处处可闻。但是，有必要弄清，斯大林讲的“民族”的这种定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都赞同的科学社会主义公认的定义，而是斯大林将考茨基等人关于民族的说法作了某些加工制造出来的独特公式。

大家通读一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或恩格斯论述德国古代和中世纪史的文章就能明白，恩格斯同斯大林的这种图式化的观点毫不相干，他颇为自由地论述了古代和中世纪时民族的形成。

列宁后来也就民族问题写了许多文章，但他并未从公式

出发，即并未从民族的抽象定义出发来论述民族问题，而且，从来没有援引过或者作为自己的论点重复过这个由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列宁的评价也是把斯大林的文章看作是解释“党的民族纲领的原则”的文献之一，仅仅是在这个范围内给予评价的。这样看似乎才是妥当的。

三 二月革命时的混乱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存在的严重弱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7年2月俄国发生革命，推翻沙皇制度，成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时暴露出来的。

1913年2月，斯大林写完《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刚刚回国，就在彼得堡被捕并被判处流放北西伯利亚。接着，他又被军队征募，在押解途中接到二月革命爆发的消息，他立即奔赴革命的首都彼得堡，从8月中旬起参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活动。当时，列宁还在瑞士流亡，一直在竭尽全力寻找返回俄国的途径。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上，载有斯大林在列宁归国之前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系列文章。读一读这些文章，就会使人再次感到吃惊：四年前因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得到列宁赞扬的斯大林，在这四年期间，同是在民族问题上，却与列宁相去甚远了。

一、例如，斯大林在《论战争》一文中，就“目前的战争”的性质和目的是这样说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它的基本目的是让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去侵占(吞并)别国的领土，主要是农业国的领土。这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竭力到处掠夺这些东西，不管被侵略国的内部制度如何。”（《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7页）

这是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的翻版。考茨基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版）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并严厉地批评考茨基的这一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片面定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但是，斯大林却毫无批判地援用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并把它作为其论述战争的基础。

二、继这篇文章之后，在《论取消民族限制》一文中，斯大林发表了令人吃惊的议论，他说，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封建贵族的统治，如果资产阶级掌握了权力，民族压迫就会失去社会基础。

他写道：“没落的土地贵族是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是民族压迫的鼓舞力量。”“在英国，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那里早已没有这种土地贵族的独立统治了，因此，民族压迫比较缓和，不那么残忍。”“在瑞士和美国，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大地主统治，那里的政权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各民族的发展比较自由，一般说

来，民族压迫几乎不存在。”（《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页）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压迫，斯大林根本没有看到。因此，对斯大林来说，由于俄国革命“推翻了封建农奴主的政权并确立了自由”，就意味着已经消灭民族压迫并为民族自由创造了“必要的实际条件。”（同上，第18页）

然而，在同一时期，列宁一封接一封地给俄国的同志们寄去所谓《远方来信》（见《列宁全集》第23卷），无情地揭露了二月革命产生的临时政府，指出这个政府的特点是背离人民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同时指出这个政府要继续进行旨在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掠夺性和强盗式战争。

三、斯大林从这里引伸出的政治方针是：要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要求临时政府向所有的交战国提出立即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要求临时政府把已经迈出第一步的民族解放斗争更加彻底地进行下去。这个方针尽管附有种种条件，但事实上是把临时政府当作革命政府予以支持的方针，最终将使俄国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使俄国继续作为帝国主义战争营垒的一员。这正是列宁在革命之前早就不厌其烦地严肃告诫俄国同志不要陷入其中的那种错误。（例如，可参照列宁1915年11月写的《几点纲要》，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0—383页）

党与《真理报》在列宁不在（俄国）期间犯下的这些错误，通过4月回国的列宁精力充沛的活动，很快就被纠正了。但是，可以说，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后的激烈变动时期，在帝国主义和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混乱，无意中竟暴露了被称为民族问题“理论家”的斯大林在理论上的真面目。

四 背离民族自决权的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在彼得堡建立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时，斯大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参加了这个政府。

11月3日发表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作为苏维埃政权在民族问题上进行工作的基本依据，宣告了如下原则：

1. 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自主权。
2. 俄国各族人民的自决乃至分立并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
3. 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
4. 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各少数民族与民族集团的自由发展。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了波兰独立，同时，在12月应芬兰政府的要求，承认了芬兰独立。在到那时为止一直属于俄国领土的其他地方，实现布尔什维克民族纲领的这个过程，或多或少走过一段复杂的道路，这是由于民族问题与该民族内部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搅在一起，或同从东方和西方打进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块的缘故。

党内一部分人中出现的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已过时的主张就是这种复杂性的表现。就是说，由于与外国干涉势力相结

合的反革命派把民族自决权当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隐身草，要求用“劳动者的自决权”来取代民族自决权的纲领。

1919年3月，革命后的第二次大会——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在审议党的纲领新草案的时候，纲领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布哈林抛出了这个主张。布哈林反对民族自决权，主张“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皮达可夫也支持这一主张，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早就是民族自决权的反对论者，二月革命后，即在1917年4月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时候，他借口社会主义名义提出了否定性的提案，认为自决权是空洞无物的。

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对他们的这种意见进行了详尽的批评。在各民族中，劳动者是否具有决定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力量，取决于这个民族内部的发展；而每个民族的发展过程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和特征。但是，布哈林等人的主张就是不承认劳动者阶级尚未掌握权力的民族有自决权，这只能理解为是要通过暴力把革命政权强加给其他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就是列宁批判的要点。

列宁在这里特别援引了波兰和德国的例子。他激烈地论证道，在这两个国家，反动派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在柏林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俄罗斯人想在共产主义名称的掩盖下，把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移植到波兰来”，劳动者自决之类的口号只能为反动派的宣传提供材料。

而且，列宁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论调的基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呼吁与之作斗争：

“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斗争。”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7、168页）

在这次党代会上，列宁批判的靶子是布哈林。但是，首先把“劳动者自决”这一干涉主义口号移植到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上来的，实际上不是别人，正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

早在1918年1月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报告了在乌克兰及其他地方进行斗争的经过，同时提出要按“劳动者自决”的精神来修改民族自决的原则：

“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权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9页）

这一年的11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中，这一主张作为革命一周年的总结，终于被公诸于世：

“对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就这样被革命进程本身所揭穿了，抛弃了。对自决原则的社会主义看法和‘全部政权归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口号则获得了被采用的全部权力和机会。”（《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6页）

这种民族自决权从属于社会主义利益的主张，同今天的

干涉主义者的议论所产生的影响完全相同。最应该一贯拥护俄国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正是从革命成功后的第一天起就在社会主义名义的掩盖下对民族自决权进行修正，并倾向于赞成“劳动者自决”这个干涉主义的口号的。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而通过列宁对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批判，“劳动者自决”的观点才受到致命打击，民族自决权被明确地写进党的新纲领中。

这一精神在列宁担任领导期间，一直严格贯彻在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上。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在与阿富汗、波斯(现在的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等邻国的关系上，废除了沙皇俄国时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特权，真心实意地为建立独立、平等和友好的关系而努力奋斗。这尤其对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很大的鼓舞。

但是，斯大林本身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并未得到解决，而在下一个阶段中又表现出来，构成更加严重的危险。

五 组成苏维埃联盟时的 两个合并计划

我们已经介绍了列宁赋予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以特殊意义一事。列宁认为，正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具有长期压迫各民族的历史，所以，特别重

视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问题，就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列宁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十分慎重。象大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特别需要慎重，因为它曾经引起所有其他民族的切齿痛恨。”（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7页）

当依靠苏维埃权力具体实施民族政策时，列宁始终坚持这种态度，并对民族政策的实行深为注意。例如，1921年9月，有人报告说，在中亚的土耳其斯坦，围绕由中央派遣的土耳其斯坦办事处官员托姆斯基与当地的组织意见分歧一事，俄罗斯人和当地居民之间产生对立情绪。列宁给在那里工作的一位同志寄去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个人非常怀疑‘托姆斯基路线’很可能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路线，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有这种倾向的。

取得当地人的信任；取得三倍、四倍的信任，证明我们不是帝国主义者，我们不能容忍这种倾向的存在，这对我们的整个世界政策是极其重要的。

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确是世界性的问题。

应当极其严肃地对待。

这个问题将影响印度，影响整个东方，这可开不得玩笑，要千倍地慎重。”（《致越飞》，《列宁文稿》第9卷第393页）

对列宁来说，是否容忍哪怕是一点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存在，是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整个世界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仍然反复发表路线完全错误的谈话。据斯大林说，所有的俄罗斯人，其中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员，“过去都是统治民族，他们没有经受过民族压迫”，除了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外，他们中间没有发生过民族主义倾向，因此用不着去克服这种倾向，而需要克服民族主义倾向的主要“是经历过民族压迫的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员。（1921年1月《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上的开幕词》，《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4页）

尽管如此，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正式报告中，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列宁的主张，原则式地强调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国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个偏向”作斗争。但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在上述引文中反映出来的。

斯大林的这种倾向作为非常具体的政策方针表现出来，并使列宁感到愕然的，是1922年制订的组成苏维埃联盟的计划。

1920年10月，由于同波兰缔结停战协定，在欧洲的干涉战争和国内战争结束了，社会主义俄国取得了开始和平建设的新条件。那时候，在今天的苏联领域内，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存的，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共六个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同其他共和国之间个别缔结了条约，分别形成了军事、经济上的同盟关系；但在新的形势下，把所有这些苏维埃共和国统一成一个联邦一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个时期，正是列宁同最终夺去他的生命的疾病进行顽

强斗争的时期。1921年底，他因过度劳累而躺倒，不得不易地疗养达数月之久。1922年3月，列宁回到莫斯科，主持了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而在大会结束后的5月，他再度移居哥尔克村疗养，因病情第一次发作，直到这年10月也未能重返莫斯科。

然而，在列宁离开莫斯科疗养期间，根据党的政治局的决定，设立了制定计划调整各共和国关系的委员会，由斯大林任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按照斯大林的方针，这个委员会制定了后来被称为“自治共和国计划”的统一方案。

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使除俄罗斯之外的五个独立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的各个机关从属于俄罗斯联邦中央各部门。这不是建立各民族平等和享有同等权利的同盟，而是暴露出大俄罗斯中心主义、要把各共和国吸收或并入俄罗斯联邦的计划。

当列宁在哥尔克疗养地得知斯大林的这个计划时，关于“自治化计划”的纲要已经党的书记处通过，作为定于10月召开的中央全会的讨论文件发给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了。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等地的党组织决定对这个计划持反对或批判态度，斯大林却凭借着中央领导机关的多数支持排除了这些反对意见。

列宁了解到这一意料不到的事态发展之后很吃惊，迅速采取了措施。他除了向斯大林谈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之外，还给其他政治局委员写信，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统一方案：“我们承认，我们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都是平等的，我们将同它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

邦……”（1922年9月《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列·波·加米涅夫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列宁文稿》第4卷第385—388页）

斯大林虽然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表示抗拒，但最终还是让了步，同意了列宁的提案，按列宁的方案制定出新草案。这个新草案被提交给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获得通过。列宁推托自己牙痛，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就是在这次全会召开之时。

1922年12月31日，按照列宁的统一方案，而不是斯大林的统一方案，召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宣言和联盟条约。

但是，斯大林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列宁的方案，却在中央全会讨论订正了的新草案时，仍然对列宁批评原草案的地方以及修改的地方佯作一无所知。不仅如此，在附加在新草案前的〈序言〉中，他大力强调了原草案是基本正确的，“可以无条件地采用”；并注明（新草案）把有关中央机关及其职能的若干项目作了修订，使之更加正确了。

列宁本来认为，由于统一方案的内容作了订正，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然而，不久他就注意到，这是一种只看到事情表面现象的乐观看法。尽管在统一方案这个原则问题上，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被击退了，但在各民族的实际关系方面，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并没有被除掉，而是显示出极为有害的发展。当列宁发现这一点时，他内疚地说道：“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果断地来过问大家都知道的‘自治

化’问题。”（1922年12月30日的口授记录，《列宁全集》第38卷第628页）
他决心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进行新的斗争。

六 大俄罗斯人粗暴的 “警察统治”

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是在斯大林的故乡——高加索爆发出来的。

高加索地区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个地区，十月革命后德国、土耳其、英国等国的干涉军相继入侵，孟什维克等反革命势力与这些侵略军勾结在一起，不断反对苏维埃政权。因此，击退干涉军队、打倒反革命派并建立三个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国内战争末期即1920年到1921年这段时间里。并且，这三个共和国分别建立了该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及其中央委员会；同时，在国内战争时期，奥尔忠尼启泽被作为高加索战线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派驻该地，战后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留在那里，组成了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

然而，奥尔忠尼启泽率领的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间在三个共和国统一到南高加索联邦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在原则上，列宁也赞成把高加索三个共和国统一为一个联邦的方针。然而，格鲁吉亚共产党内以中央委员穆迪瓦尼和马哈拉泽为首的人中，存在着反对统一、坚持民族独立的强

烈情绪，他们同要推进联邦设想的奥尔忠尼启泽的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之间一再发生冲突。奥尔忠尼启泽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加紧推行统一计划。1922年8月，他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拉到自己一边，不顾格鲁吉亚的反对而强行发表了南高加索联邦的先法草案。

这样，在创建高加索联邦一事上的纠纷之火燃烧起来时，又在统一到苏维埃联盟问题上发生了对立，这就使问题越来越复杂了。格鲁吉亚共产党强烈反对斯大林要把各共和国吸收合并于俄罗斯联邦的统一计划。

有关组成苏维埃联盟的原则的问题，由于列宁的坚决干预而基本上解决。但对格鲁吉亚共产党说来，并不是一切都解决了。这是因为，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要求在高加索三个共和国合并之后，作为南高加索联邦加入苏联，而与此相反，格鲁吉亚共产党坚持主张各共和国作为独立的加盟国加入苏联。

为了解决激化了的纠纷，奥尔忠尼启泽诉诸强制手段。他给穆迪瓦尼、马哈拉泽等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扣上“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帽子，然后把坚持格鲁吉亚方针的人召到莫斯科，即命令他们离开格鲁吉亚迁到莫斯科。事态发展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种片面的命令提出抗议，十一名中央委员中甚至有九名决定辞职的地步。但是，高加索边疆区工作委员会稍事等待之后，任命了顺从莫斯科方针的新中央委员会，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立即同意了这一处理措施。……纠纷就这样在激化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发生了奥尔忠尼启泽殴打持反对意见的党

员的暴力事件。

奥尔忠尼启泽同斯大林一样，是出生于格鲁吉亚的革命家，但他的这些行动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典型。后来参与这一事件的捷尔任斯基出生于波兰。

列宁事后得知斯大林支持的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时，在其口授记录中对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员加以严厉批评：“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同时，又赋予他们“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的特征。（《列宁全集》第38卷第629、630页）“杰尔治摩尔达”是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警察，列宁总是把这个名字作为野蛮的“警察统治”的代名词来使用。他常常用这个词来谴责沙皇专制制度的警察统治。他进而把1917年声讨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拒绝乌克兰人民的自决权一事谴责为“这是一件空前未有的丑事，这是反革命分子极端卑鄙的行为，这是大俄罗斯‘警察’政策的真正表现”（《列宁全集》第25卷第85页）。在1919年，他又把得到干涉军支援的反革命高尔察克专政叫做“恢复了警察式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29卷第485页）。列宁在预定通知党的正式文件中，把形容沙皇制度、克伦斯基以及高尔察克的同一个代名词转用到斯大林一伙的身上一事，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列宁最初知道他们大国主义的横暴行径时是多么愤怒和惊讶。

当纠纷发展到发生暴力事件时，莫斯科的党中央也不能听凭奥尔忠尼启泽为所欲为，11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派遣由捷尔任斯基等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到当地进行调查。列宁在通过这一决定时弃权。列宁在此之前一直是信任斯大林和奥尔

忠尼启泽的，他认为错误似乎在穆迪瓦尼等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一方。但从这时起，他开始对事态的发展产生深深的怀疑，并开始独自就格鲁吉亚问题作调查。

12月12日，列宁终于等到捷尔任斯基归来，听取了他的汇报。要言之，这是对斯大林等人有利的报告，这个报告说什么奥尔忠尼启泽是“正确”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是“错误”的。对列宁说来听取这个显然不公正的报告是极为痛苦的。过后，列宁说，同捷尔任斯基的谈话“给我的刺激很大”。书记录了列宁的这句话。第二天早晨，列宁病情第二次发作，医生命令他绝对休息。

列宁离职疗养期间，政治局和组织局在第二年1月的会议上通过了捷尔任斯基等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的结论。而对已经了解“格鲁吉亚事件”全貌的列宁说来，为了苏联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现在和将来，显然不能任凭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他决心不顾自己重病在身，奋起斗争，以便从根本上纠正党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接连犯下的重大错误。

七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

列宁病倒以后，似乎也打算尽可能亲自出席将于翌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恐怕是考虑到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从12月23日开始，列宁在病床上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一系列信件。其中很多信件被定为“极密”文件，装进用蜡封口的信封里，规定只有列宁，或者列宁死后只有克鲁普斯

卡娅夫人才有权启封。

列宁首先口授了题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信件，指出，列宁死后，党中央委员会存在分裂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特别是来自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为了防止分裂，建议代表大会采取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等措施（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是由二十七名中央委员、十九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

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对中央委员会很多同志的个人品质进行了深刻评述，说托洛茨基“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以及他过去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二月革命后的1917年夏天），指出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的动摇等。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对布哈林和皮达可夫也进行了评论。而且，对斯大林表示担心。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俄国党第一次设置总书记这一职务，并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是在当年4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在此之前，尽管任命了若干名书记处书记，但却没有总书记。但是，斯大林就任仅仅八个月，就掌握了使列宁深为忧虑的“无限的权力”。

列宁口授完这一信件，对斯大林更加担心了，十天后再断然建议代表大会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以“补充”的形式加写到信件中。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

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1923年1月4日补充，《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6页）

列宁继续说，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即便是小事，也是对党的未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他反复强调了事情的重要性。

列宁之所以加以“补充”，恐怕与在续写给代表大会的信之后，重新研究了斯大林等在民族问题上登峰造极的“粗暴”做法有联系。

列宁在下面的信件中，提出了国民经济的计划问题。他建议，给作为“内行、专家、科学技术代表人物的总合”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更大的权限，包括立法和在一定程度上不受行政干涉的独立。列宁所担心的是，在经济工作领域，出现了一种夸大“行政方面的作用”、轻视计划经济所必要的科学知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样的科学机构的倾向。

“我认为，在这里夸大‘行政方面的作用’正象夸大其他任何方面一样，是同样有害的。国家机关的领导者应该具有出色的吸收人材的能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基本的方面。不然，工作就做不好。”（《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3页）

列宁在这里对夸大“行政方面的作用”这一经济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所表明的担心，具有何等的先见之明和深刻而重要

的意义，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最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12月30日，列宁开始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是信件的最后部分。列宁在这份信件中，用最尖锐的语言揭发了斯大林在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列宁开始口授信件的这一天，举行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大林高声朗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

列宁的秘书福齐也娃曾回忆了列宁一面与疾病作斗争、一面用两天时间口授这份信件的情况。

“那一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玛丽亚·沃洛迪切娃·阿基莫夫娜口授信件：《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口授分两次，各进行了十五分钟。此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两次书，每次均为二十分钟。据科热夫尼科夫博士说，列宁对第一次的口授非常满意，但开始第二次口授时，进展不太顺利，这使他感到懊恼。

“12月31日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情很不好。在患病期间，这是常有的事。但到傍晚，心情相当好。

“傍晚，口授了两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对这项工作表示满意。”（《回忆列宁》）

八 列宁最后的斗争（上）

让我们看一下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吧。

列宁首先提出了奥尔忠尼启泽的暴力事件，指出这不是偶发事件，事情发展到他竟会做出动手打人的过火行为，这本身证明，“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这种‘自治化’计划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并且说，既然对异族人的这种做法盛行，那么，即使在条约上写上具有“退出联盟的自由”那也“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下流货和暴徒，典型的俄罗斯官僚分子）的侵害。”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9页）

为什么我们掉到这样的泥潭里去了呢？责任应该由谁负呢？

列宁指出的第一个责任者是斯大林。“我认为，在这里，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发脾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

第二个责任者是奥尔忠尼启泽。当事人奥尔忠尼启泽，无论受到何种挑拨和侮辱，都没有权利以此为借口而发怒，绝对不容许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的行为。对于普通公民和他指责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来说，他们没有克制自己的义务，相反地，“奥尔忠尼启泽应当克制自己”。

第三是，捷尔任斯基对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的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过错”。（《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0页）

列宁在做出这种评定之后，开始谈论带有根本性的国际主义问题。

列宁认为，象大俄罗斯人那样具有压迫、侮辱异族人的历史的大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要获得其他民族的信任，就不仅要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对他们的不平等，站在这种立场上，才是最重要的，才是对于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

“压迫民族即所谓‘伟大’民族（这种民族不过是因为实行暴力才伟大，不过是象杰尔治摩尔达那样伟大）的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

对于无产者什么是重要的呢？对于无产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最大的信任。那么需要什么呢？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而且需要这样或那样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过去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1—632页）

可是，斯大林等在格鲁吉亚又是怎么干的呢？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基于民族独立的原则，不赞成他们的统一计划。斯大林等就抓住这一点，给他们戴上“社会民族主义”的帽子，

组织上给以处分，甚至发展到使用暴力。福齐也娃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列宁气愤地说，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公然在公开集会上使用了‘毫不姑息地揭发、根除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一措词，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中央委员使用了‘倾向分子’这一侮辱性的用语。”列宁在这封信里提到了这个问题。

（他（指列宁）在注释中说，想给别人戴上“倾向分子”帽子的斯大林自己等人“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者’，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对斯大林等在格鲁吉亚的工作加以根本的批判。

“我想，在这里，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非常谨慎，必须采用关心和让步的态度。如果一个格鲁吉亚人（指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著者注）蔑视事情的这一方面，轻蔑地滥用‘社会民族主义’这个指责，这个格鲁吉亚人就在实质上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对待民族不公平更能阻挠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侮辱’的民族的人对平等感、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同志破坏这一平等（哪怕是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是最敏感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比让步不够、温和不够要好些。”（《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2页）

当斯大林等对苏联境内的格鲁吉亚民族犯下了民族不公正错误的时候，列宁进行了如此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违反

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现代的大国主义者们，对阿富汗和波兰等苏联领域外的各民族，一面口口声声称社会主义的“同志”，一面却为所欲为。假如列宁看到他们这种行为，又会怎样痛斥他们呢？！

九 列宁最后的斗争(下)

列宁继续口授信件。

1922年12月31日傍晚，列宁口授了最后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列宁出于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考虑，提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具体措施，即建议“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时，主张在这时要采取特别的警惕措施，忠实地、策略地同借口各个领域里的业务和制度“统一”而造成大量的“真正俄罗斯式的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

列宁在谈到“格鲁吉亚问题”时要求，应当处分奥尔忠尼启泽以儆效尤，要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3页）

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列宁对于格鲁吉亚纠纷，没有采取“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有责任”的态度，一句也没有指责穆迪瓦尼等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这件事应当这样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格鲁吉亚方面提出了错误的主张，正如信的末尾部分所说的那样，也“必须非常谨慎，必须采取关心和让步的态度”；

而且得出了结论，使事态恶化的罪魁祸首是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他们只是企图用大俄罗斯式的压迫的方法，来解决应当象上述那样处理的意见分歧。

重要的是，列宁最后是站在同帝国主义进行世界规模的斗争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为了肩负起解放世界各民族的重担，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

“如果在东方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在他们开始觉醒的时候，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其他民族采取即使是微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一方面，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都会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4页）

列宁在口授了这封信之后，从翌年即1923年1月开始，又口授了几篇预定发表的文章。这就是：《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都发表在《真理报》上。

另一方面，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举行之前，列宁亲自决定重新调查格鲁吉亚问题。排除斯大林的种种阻挠，2月1日终于收到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材料，指示三位秘书对这

份材料分别进行调查和研究。这时，列宁要他们弄清下述问题：

“（1）为什么指责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具有（沙文主义）倾向性？

（2）为什么指责这个中央委员会违反了党纪？

（3）为什么指责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压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4）压制的肉体方法（生物力学）；

（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与不在的情况下俄国共产党的方针；

（6）（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态度。该委员会是只讨论了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责，还是也讨论了对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指责？是否也研究了‘生物力学’的事例？

（7）实际情况（选举运动、孟什维克、压制、民族不和）。”

（参阅《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606—607页注288）

列宁连日督促秘书加紧调查。另一方面，在2月14日，把党中央监察委员索尔茨叫来，列宁通过秘书告诉他，自己站在“被侮辱者”即格鲁吉亚共产党一边，并委托他将这一消息告知格鲁吉亚的某位负责人。列宁还在同一天让秘书把他的结论记录下来，即：“沙文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倾向”之类的指责，证明沙文主义倾向本身就是“大国主义的东西”。

3月3日，秘书们把用一个月时间调查格鲁吉亚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提供给列宁。在两天后的3月5日，列宁给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写信，请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让秘书用电话传达给托洛茨基。信中写进了结论性

的评价，“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5页）

列宁在同一天就斯大林辱骂克鲁普斯卡娅问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要他斟酌：是赠礼道歉还是断绝同列宁的关系。列宁指示，要把这封信在第二天即6日送到斯大林那里。

列宁还在3月6日给穆迪瓦尼、马哈拉泽以及其他格鲁吉亚党员写了一封信，直接告诉他们，自己是他们的朋友。

“尊敬的同志们，

我全心关注着你们的事。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5页）

显然，列宁根据慎重的调查，得出了可靠的结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全面证实了上一年年底他口授的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信件的内容。上面介绍的三封信表明，列宁虽然重病卧床，但却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以便在即将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把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危险的大国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

但是，从此事态急转直下。在口授给穆迪瓦尼等人的信之后，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3月10日，第三次发病，右半身瘫痪，丧失说话能力，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以后，曾几度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但最终也未能回到政治活动中来。

十、“遗嘱”得到遵守了吗？

列宁以“遗嘱”形式口授的这些信件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从秘书福齐也娃的手里，经过种种曲折，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举行之前送到了党的领导机构。可是，对于列宁来说，不幸的是，党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在格鲁吉亚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的严重性，没有一个人代替列宁来实现列宁的意愿。列宁在信中特别要求予以协助的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从他的自传性文章来看，好象在收到列宁给他的信以前他并不十分了解格鲁吉亚问题，因此，在会上只是要求斯大林对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而不了了之。后来，托洛茨基作为反对派，对以斯大林为中心的党的领导集团进行了斗争。但这种斗争是围绕着在苏联有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这一问题展开的，同列宁计划的“最后的斗争”完全不同。而且，在这场斗争中，站在维护列宁路线一边的是党的领导集团和斯大林，而托洛茨基则是作为被列宁批判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复辟者出现的。

据现在发表的材料，在4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与会的代表宣读了列宁的信件。按公认的历史记载，列宁的指示写进了大会的决议。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民族问题报告的却是那位列宁要追究其错误的斯大林。

斯大林在这个报告中，在谈到地方沙文主义的同时，也谈到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是，他只是对别人的错误提出警告，而一句也没有谈自己本身被列宁批判的错误。不但如此，他指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一切错误都在穆迪瓦尼等格鲁吉亚“倾向分子”一边，奥尔忠尼启泽的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和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都在代表大会的名义下给予肯定。

那么，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又怎样呢？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逻辑可以说是斯大林式的诡辩的典型。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同“本民族的沙文主义”作斗争，而不应该谈其他民族的沙文主义；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无疑是“民族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但这是俄罗斯的共产党员的义务，不容许异族的共产党员插手。

“如果从事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斗争的不是俄罗斯的共产党员而是土耳其斯坦或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那么这种斗争就会被认为是反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了。”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6页）

这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诡辩论。把这种逻辑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昭然若揭了。就是说，假如苏联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那么，只有苏联共产党员有义务同这种错误作斗争，而受到干涉或迫害的国家的共产党与此作斗争就是反苏的沙文主义。

斯大林就这样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作出了同列宁信件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在一般论述中，还进一步主张，加强工人阶级政权才是最优先的权利，民族自决权应该从属于这一权利。

“应当记住，除了民族自决权以外，还有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自决权从属于后一权利。有时候会发生自决权同另一个权利，即同最高权利——执政的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相抵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自决权不能而且不应当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专政^①权利的障碍。前者必须向后者让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5页）

这实际是从正面反驳了列宁在信件中所阐述的思想。

列宁的宝贵指示事实上就这样在列宁没有参加的党代表大会上被埋葬了。而且，这份信件在代表大会之后被严密封存起来，直到三十二年后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之前，一直束之高阁，无人过问。

载有对各个政治局委员的评论和要求解除斯大林职务的建议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由克鲁普斯卡娅一手保管，1924年1月列宁死后，由克鲁普斯卡娅移交党中央领导机关，在5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与会代表作了宣读。

这时，俄国共产党党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托洛茨基等提出了自己的政纲，开始用宗派手段攻击党中央，对付这种派别活动、维护党的团结成为重大的问题。据公认的党史指出，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在审议了列宁的信件之后，考虑到当时的党内形势和斯大林的作用，以及他可能会从列宁的批评中汲取教训，同意斯大林留任。

后来，这个问题由反对派重新提出来的时候（1927年），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对事情的

^① 此处日文译为“执政”。——译者注

经过进行了辩解，他说，我曾请求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但是，包括托洛茨基等在内“所有代表团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同时，他突然正颜厉色地说，态度“粗暴”不是什么政治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3页）

在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斯大林完全无视列宁对他的大国主义的政治批判。列宁批判的核心是，即使在“粗暴”问题上，“粗暴”本身如果被置于脑后，就是重大的政治缺点。这一点，斯大林根本不想理解。

列宁在“遗嘱”中指责斯大林的这两个缺点时，还用了“看来可能是小事”（列宁自己这样说）的措词，所以，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正因为如此，列宁尽管发出了警告，但俄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却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个警告。可是，大国主义和“粗暴”的缺点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何等严重的打击！从那以后的历史使我们痛感到列宁的预见是何等的正确。

十一 大规模镇压与世界

大战爆发

列宁死后，在一段时期内，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时，社会主义苏联尽管存在很多困难，但却一

直相对地健康发展。同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及各个反对派的斗争，也没有采取斯大林后来惯于采取的手段——镇压的方法，而是从大局上采取了党内斗争的方法，结果以斯大林为中心的党中央的胜利而告终。1929—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有了一定的进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使两个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攫取了权力，地球上开始笼罩一团不祥的乌云。为了对付法西斯主义，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倡议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苏联本身也奉行了争取建立民主国家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政策，这一举动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威信。

但是，由于事情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列宁曾警告过的、斯大林的两个缺点又以超乎列宁预料的重大而严重的形态表现出来。首先，以1934年党的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为契机，开始对党和政府的所有机关进行大量镇压。把这一问题仅仅归于斯大林的性格是不科学的，毋庸置疑，列宁所担心的斯大林的“粗暴”是导致进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镇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使这种大量镇压正当化的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愈大，敌人也愈加凶恶，阶级斗争也愈尖锐。这一理论也是斯大林1937年8月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自己提出来的。（《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册第112页）

1937—1938年，这种镇压波及到在共产国际等机构工作

的外国共产党干部和活动家。在这里，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最野蛮的表现是，肆无忌惮地、粗暴地镇压本国共产党和外国共产党。日本的共产党人山本悬藏和国崎定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也是在1937年。两人都因这种践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纪律的非法迫害，损害了健康，国崎和山本先后于1937年12月和1942年4月病死。

特别是，波兰共产党受到斯大林的残酷镇压。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对在地下活动的波兰共产党进行毫无根据的中伤，说什么在波兰共产党“担负领导的活动家中潜藏着很多敌人的走狗”，并决定解散波共。1956年2月，苏联等五个欧洲的共产党联名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当时对波共的指责是“根据挑拨者们伪造的证据”而进行的，是无中生有的检举，十八年之后，为波兰共产党“恢复了名誉”。但多数领导人由于“反革命”冤案已经丧失了生命。

这种大量镇压活动是以秘密的形式进行的，当时，不论在苏联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只有极个别的有关人士知道事情的内幕。

斯大林为了应付世界大战前夜紧迫的国际形势，匆忙改变了其外交政策，之后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条件支持他的行动。这时，大国主义的危害明显暴露出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世界上树起了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一面大旗，而斯大林的突变发生在四年后。

1939年，为了反抗希特勒德国的侵略，缔结相互援助条约，苏联同英国和法国在莫斯科进行谈判。但斯大林看到英国等对这种谈判没有真正热情，于是改变方向，8月23日同

希特勒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这个条约规定，双方互不侵犯、不参加敌视另一方的同盟等。除了正式条约外，还补签了规定苏联和德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边界的《秘密议定书》。战后，美国政府在冷战的最初时期，发表了缴获的德国外交部保管的公文中关于1939年—1941年德苏关系的各种文件，其中包括这个《秘密议定书》（1948年1月）。苏联方面立即以苏联情报局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历史的伪造者》的反驳文件，指责美国政府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发表的只是文件的一部分，德国方面的记录有片面性等。但对《秘密议定书》只字未谈，根本不想否认它的存在和内容。公诸于世的《秘密议定书》关于波兰部分规定：“对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进行领土上、政治上的重新瓜分时，原则上以纳雷夫（一译那累夫。——译者）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为界。”显然，事前商定了“紧急状态”时的分割线（据美国国务院编：《大战秘录》，读卖新闻社1948年出版）。据说，《议定书》同正式条约一样，是由两位全权委员——苏联总理兼外长莫洛托夫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签署的。这个《议定书》成为苏联开始采取大国之间分割“势力范围”政策的转折点。

9月1日，德国开始侵略波兰，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以示回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了。德国用闪电战占领了波兰的西半部，紧接着，苏联政府在9月17日宣布：“波兰国家及其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并以保护在此以前属于波兰领土内的西部乌克兰及西部白俄罗斯居民的生命财产为借口，出动苏军，占领了波兰东半部。苏联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同盟国方面也曾劝告说，从“民俗学”的立场

看，这个地区（指波兰东半部。——译者）应该属于俄罗斯（即所谓正式边界线），后来，波兰发动了侵苏战争，1921年，同苏联签订了里加条约，把这块地盘划入了波兰。

过去，人们常常解释说，苏联采取这种行动是为了防备可以预料到的德国对苏侵略，把“防卫线”向前推进了，就是说这同反法西斯斗争是一致的。但苏联领导集团当时在外交上的大转变确实远远超过了这种解释。

9月28日，德苏两国在莫斯科缔结了《边界条约》。两国的边界线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月前的《秘密议定书》的规定划分的。这一天，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赞扬这项条约的缔结奠定了“东欧永久和平的牢固基础”，并说，两国将为结束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的战争状态而共同做出努力，一旦这种努力无结果时，那么，战争继续下去的责任就应该由英国和法国来承担。

接着，10月，莫洛托夫（总理兼外长）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大战爆发后的苏联外交》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声称，“我们直至最近一直采取的公式”——德国为侵略者、英国和法国等为其反抗者的公式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侵略’与‘侵略者’的概念有了新的具体内容，有了新的意义。……今天，就欧洲各列强来说，德国属于为早日结束战争和为了和平而做出努力的国家之列，而直至昨天一直反对侵略坚持抗战的英国和法国则属于赞成战争继续下去、反对缔结和平条约的阵营了。”

莫洛托夫还极力指责说，英国和法国认为这种战争是“打

倒希特勒主义”的战争，并以此作为继续战争的理由，这使人想起了中世纪的“宗教战争”。

“不管是希特勒主义，还是其他的任何思想体系，接受或者拒绝都是各自的自由。那是从政治上看问题。但是，任何人都知道，意识形态是不会被力量所破坏的，是不会被战争所根除的。因此，打着为‘民主主义’而战的幌子继续进行‘打倒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是一种罪恶。”

在德苏关系上，莫洛托夫说：“我们一贯认为，强大的德国是维护欧洲和平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说，苏联“准备支持德国为恢复和平所做的努力”。

就这样，在德国侵略波兰从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莫洛托夫指责的矛头不是对准德国，而是主要对准英国和法国，而且，对其“罪恶”的谴责不是因为对希特勒采取了绥靖态度，而是因为采取了继续战争的方针。这就从过去的反法西斯外交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言而喻，事情的背后隐藏着斯大林的意图和方针。

十二 将德苏条约路线强加于人的大国主义

苏联这种外交上的转变，尽管背后可能出于为将来进行对德战争作准备的策略上的考虑，但却使各国共产党处于政治窘境之中。因为他们正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

方针全力以赴发展反法西斯战线。

但是，斯大林根本不想把事情仅仅停留在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上，而是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苏联新的外交政策，要求把这一点作为衡量各国行动的新标准。

根据这一方针，共产国际 10 月在其机关杂志上发表了署名季米特洛夫的题为《战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文章，表明共产国际本身站在同苏联外交一致的立场上。季米特洛夫的文章表明全面支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说它“挫败了战争挑拨者们的利己计划，确保了欧洲两大国之间的和平”，同时，把已经开始的战争称为“交战国双方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非正义的战争”，并仿效莫洛托夫，把指责的主要矛头指向英国和法国。

在此以前，欧洲国家被区分为意大利和德国“侵略国”同其他“非侵略国”。但现在，这种区别消失了。“现在，扮演着最热心地主张战争继续下去和进一步扩大战争的竟是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

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阶级利用群众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气氛，把他们对德国的战争吹嘘为“民主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为了全体国民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必须彻底粉碎所谓这种战争具有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性质的说法。”

这同四年前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德国法西斯才是战争的主要挑拨者，假如德国在战争中胜利了，那就显然意味着欧洲各民族变成了奴隶，因此，“集中我们的炮火对准德国法西斯主义，是所有革命家的义务。”完全没有迹象表明，共产国

际举行了取代上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宣布了世界大会的方针已“落后于时代”，因此决定予以废除。以斯大林为中心的苏联领导集团也无视共产国际这一国际组织的民主法则，把它变成了执行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

在此数月后，即1940年4—6月间，希特勒德国开始侵略北方和西方，先后征服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因此，完全可以想象，西欧各国的共产党面对苏联外交政策上的无理要求同形势和人民的要求之间的深刻的矛盾，经历了何等痛苦的历程。

我党副委员长西泽去年夏天访问了西欧各国。归国后，据他说，欧洲很多党最近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开始清晰记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痛苦教训”。这里就是指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的1939—1940年的“深刻教训”。

如上所述，共产国际支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提出了把主要攻击矛头对准英国和法国的新方针。

“就这样，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墨迹未干，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就被希特勒德国——而不是被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的铁蹄所践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把抗击德国人入侵视为反法西斯斗争的延长线，站在人民的前头，同德国侵略军作战，最后献出了生命。据说，在比利时，当时有四千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两千人战死。”（西泽富夫：《欧洲革命的胎动》，载日本《文化评论》1981年12月号）

但是，在法国败北后的1940年8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莫洛托夫还在报告中重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新

形势下的重要意义。他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美国。当时，英国表示与希特勒对抗、继续打下去，而美国表示支持。莫洛托夫指出，英国和美国的动向是导致“战争今后进一步扩大和转化成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重要因素之一。苏联在外交上采取的这种态度使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矛盾更加深刻。

这种矛盾在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开始发动侵苏战争，美、英、苏反法西斯大联盟成立时，在实践中消失了。

而且，在1939年以后的时期，尽管面临重大的困难，但各国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以及大战中，站在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抵抗斗争的前列，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及其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的自由和民主遭到了严重威胁。从大战前夜和大战中的情况来看，为反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黑暗政治和侵略战争，日本共产党开展了斗争。此外，高举民主、自由、独立、和平的旗帜，站在各国人民斗争的前头的，是共产党人及其政党。无论是在欧洲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斗争或反纳粹抵抗斗争中，还是在中国人民及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抗日战争中，都有无数的共产党员为民主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这些斗争通过全世界同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教训证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才是争取民主自由的先锋战士。”（《自由民主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当时，斯大林在最高苏维埃选举（1946年）时发表选举演说中，对自己1939—1940年的行动没有做一点自我批评，而只是非常

笼统地说，这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

“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战争的性质。恢复民主自由也是其任务之一。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

（《斯大林文选》下卷第442页）。

这意味着订正 1939 年美化希特勒德国的错误。但是，苏联把共产国际变成了推行苏联外交上的大国主义的工具，由此把它的错误路线强加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各国共产党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痛苦和损害，斯大林对此没有做一句反省，一点也不痛心，而是不以为然地进行了这样的订正，这里也表现出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

（《斯大林文选》下卷第442页）。

十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与过

（《斯大林文选》下卷第442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反法西斯盟国打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侵略势力方面，社会主义苏联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欧洲，顶住希特勒德国侵略者发动的“闪电战”的只有苏联，它牺牲了两千万人，国土和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苏联在击溃希特勒的侵略和摧毁战争机构方面，名副其实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这是在二十年来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赢得的胜利，尽管在这中间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曲折。就象后来涌现的许多以这次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所表明的那样，这场“伟大的卫国战

争”，整个来看，可以说是在革命后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谱写出的一部英雄史诗。

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是不能加以忽视的：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没有消除同斯大林密切相关的、应予否定的倾向。而且，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使人感到，这种倾向反而比战争爆发以前更加突出和严重了。特别是大国主义的倾向，失去了控制，恶性地膨胀了。

第一，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美化沙皇制度的风气日益盛行。

斯大林在战争第一年庆祝革命纪念日那天，在检阅红军时的演说中，是这样鼓动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的：

“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到了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札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

这样一来，在十三世纪同瑞典军队和德国骑士团作战的司令官涅夫斯基、在十四世纪同鞑靼族作战的莫斯科公国的大公顿斯科伊、在十七世纪击退了波兰的干涉的米宁和波札尔斯基以及反抗拿破仑的帝俄将军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等，所有在过去数百年里同外国作战的将领们，都统统被捧为解放战争的“伟大的先辈”。

斯大林的这一号召，使得各个领域里刮起了一股超历史

的民族主义的风潮，极力称颂沙皇时代的俄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是融为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据博法编写的《苏联史》（1979年日本大月书店发行的日译本）称，在战争时期召开的一次历史学家会议上，有人对“把专制政治的掠夺殖民地政策加以合法化的倾向”表示担忧。但是，这一抗议似乎是白费口舌，最后还是销声匿迹了。

第二，斯大林对苏联内部的民族政策，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政策。

1945年5月，斯大林在庆祝战胜德国，为红军将领举行的宴会上，举杯敬祝俄罗斯人民健康，称颂俄罗斯人民是加入苏维埃联盟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起领导力量的人民”和具有“明确的智慧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的人民。

另一方面，斯大林对于其他各民族，则以一部分人帮助过德国占领军为理由，在战争期间不止一次地对整个民族采用暴行，进行惩罚。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1956年）上作的所谓“秘密报告”，就此事作了如下叙述：

“更为恐怖的，是那些粗暴地破坏列宁的苏维埃民族基本政策的行为，这些行为的主谋便是斯大林，我们所指的，就是把整个民族集体地驱逐出他们的故乡，这种驱逐，连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也毫无例外；而且这个行动并不是出于任何军事理由而采取的。1943年底，前线已出现了有利于苏联的前驱直进的形势，斯大林却采取了一项决定，把所有卡拉恰伊人从其家乡赶走。1943年12月底，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人民，也都遭到同样的

命运。1944年3月，车臣—印古什的全体人民均被驱逐，而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名称亦被取消了。1944年4月，所有巴尔卡尔人均被从他们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原来的居住地驱逐到遥远的地方，而该共和国亦被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之所以能够免遭这样的命运，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太多，无处驱逐。”

斯大林想出的这项惩罚民族的政策，恰恰表明列宁所担心的“粗鲁的大俄罗斯人的警察统治”达到了顶峰。

第三，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美英苏三大国准备就夺取战争胜利的军事问题和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也表面化了。他把谋求苏联的国家利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为达到此目的，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不惜让别国的解放运动的利益服从本国的外交需要。

对待希腊问题的作法就是一个典型。英国的邱吉尔为了把战后的希腊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用武力粉碎了从1944年底到1945年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希腊的抵抗势力（人民解放阵线），把符合自己心意的保守政权强加给希腊。

在此之前，1944年10月，邱吉尔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建议签订一项协定，以便使希腊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事实上是要在巴尔干瓜分势力范围。根据这一协定规定，希腊是英国应当保持“百分之九十的优势”的地区。这是一项不成文的协定，是以下面这样一种形式达成的：邱吉尔画了一张表格，以百分比表明英国和苏联在每个巴尔干国家应占多大

的优势，而斯大林则对表格中的内容表示愿意。但是，当英国后来在希腊进行了为期几个星期的血腥镇压时，苏联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从而受到了邱吉尔的称赞，认为苏联采取了忠于“谅解”事项的态度。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事后给邱吉尔的信中说，因为我们理解“希腊对于英国的安全保障的意义”，所以对希腊问题没有加以干预，从而正式表明了容忍通过大国间的交易决定别国人民命运的瓜分势力范围的态度。（1945年4月25日给邱吉尔的信）

试图依靠大国间的协定干预别国人民的前途的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不论在南斯拉夫的问题上还是在**中国的问题上都有所表现，而且对战后的国际政治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十四 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恩格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掀起的美化沙皇制度的思潮，在理论上曾有过一个前奏曲。

在希特勒德国对苏开战之前，即在德国忙于出兵巴尔干和控制南斯拉夫和希腊的1941年5月，苏联共产党的理论杂志《布尔什维克》发表了斯大林的一篇文章。

这篇题为《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的文章，是斯大林在七年前的1934年7月19日写的。这里所说的恩格斯的著作，是恩格斯晚年的著作之一（1890年执笔）。恩格斯在这篇著作中探索了沙皇政府从十八世纪中期

到十九世纪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历史，同时深刻地阐明了以打倒沙皇政府为目标的俄国革命党的事业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列宁在接到恩格斯逝世的讣告后所写的悼词中，把恩格斯的这篇著作列为他的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全集》第2卷第1—12页）。

可是，1934年，当《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建议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周年的专辑上重新刊登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时，斯大林反对这样做，并以给党的政治局委员写信的方式写了《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这篇文章。

斯大林反对的理由是：恩格斯的这篇论文过分热中于在欧洲的舆论面前攻击俄国的对外政策，忽略了“一系列其他更重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因素”，其结果，使读者陷入了片面性的错误。斯大林列举了这篇文章的以下几个方面的“缺点”。

第一，恩格斯解释说，俄国沙皇政府推行的侵略政策，不仅仅是由于俄国的军事封建商人上层寻求海上通道的“需要”，而且也是由于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是一帮似乎是万能的和非常有才能的冒险主义者”。

斯大林认为，经恩格斯这么一解释，结果这批外国冒险家把俄国变成了军事上最强大和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从而和自己下述的见解发生了矛盾。就是说，如果按斯大林的说法，“十分卑鄙龌龊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而是欧洲各国国王和外交家所具有的。

恩格斯抨击沙皇政府时，有点“兴奋了”，结果便不知不觉地忘记了众所周知的“某些最基本的事情”。这就是斯大林在：

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结论。

第二，斯大林认为，在论述欧洲形势的特点、分析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的原因和前景时，恩格斯忽略了“争夺殖民地、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的帝国主义斗争这个因素”。“我认为这些忽略之处是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缺点”。（斯大林语）

因此斯大林认为，恩格斯把企图在巴尔干扩张领土的沙皇俄国的斗争看作是战争的決定因素，轻视了德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及其矛盾，过高地估计了沙皇政权的反动作用（认为它是“全欧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犯了政治错误。这一错误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那些主张“保卫祖国”的人容易地犯了背叛性的罪行。这就是斯大林对恩格斯的文​​章所作的结论性的评价。

据斯大林说，沙皇政府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已经不是全欧的反动中心了，而英国和德国等国家成了反动中心，所以恩格斯把国际斗争的矛头指向俄国，是根本错误的。

“事实上，自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失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沙皇政府在欧洲的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作用已经开始显著地下降了，而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沙皇俄国实质上是充当欧洲主要大国的补助后备部队。”

斯大林在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形势的特征时，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失败这段历史，并由此对于1890年的恩格斯提出了意见。

斯大林这时还没有走到对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直接肯定的地步。但是，从以后的经过来看，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却为

美化沙皇政府作了准备，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还援引了列宁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说什么恩格斯的看法同列宁的政策显然是不相容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女革命家伊涅萨·阿尔曼德曾持有和斯大林同样的观点。列宁诚恳地解释说，她企图把1914年到1917年的“保卫祖国”的罪名加在1890至1891年的恩格斯的头上，是犯了把两个不同时期的完全不同的形势相提并论的错误。

“您忘记了主要的一点：1891年根本不存在帝国主义（我在我的小册子里竭力证明，它是在1898—1900年产生的，不是在这之前），也不存在帝国主义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不可能是这样。……恩格斯是正确的。”（1916年12月25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256页）

“1891年。法国和德国的殖民政策还微不足道。……在西欧形成了一个**体系**……形成了一个国家体系，这些国家大体上是立宪制的、民族的国家。除了它们以外，**还存在着**强大的、不可动摇的、革命前的沙皇制度，它几百年来一直掠夺和压迫一切民族，并镇压过1849和1863年的革命。

德国（1891年）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于是沙皇制度便同布朗热主义（法国的反动派）结成联盟对这个国家进行威胁！

当时的形势和1914—1917年的形势截然不同。现在，沙皇制度被1905年动摇了，而德国为了独霸全世界正在进行战争。完全是**另一回事**！！

把1891年的国际形势同1914年的国际形势相提并论，甚至把它们等量齐观，是非常不符合历史观点的。”

(1917年1月19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63页)

列宁不是站在斯大林一边，而是站在恩格斯一边，这一点恐怕是清楚的。

受到斯大林攻击的，不仅是恩格斯一人。马克思写过一篇论述俄国沙皇政府自伊凡三世(十五世纪)以来的侵略欧洲的历史与英国外交关系的重要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的内幕》。这篇文章从1856年到1857年连载在英国的报纸上，马克思逝世后，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将这篇文章在伦敦出版了单行本(《十八世纪的秘密外交史》，1899年出版)。列宁在《卡尔·马克思》(写于1914年)这篇文章的参考书目一章中也介绍说，这篇著作论述了“英国自由党部长们对俄国的经常的自私自利的依赖。”

但奇怪的是，战前出版的俄文版全集和战后出版的德文版全集，都没有收入马克思的这篇重要著作，而且这种现象从斯大林时代一直持续到今天。全集的编辑人员是无法把列宁的这篇论文中所提到的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抹煞掉的，马克思的文章《福格特先生》(写于1860年)和以后马克思与恩格斯从1856年到1857年的通信，也详细地叙述了这篇杰作的写作和发表的过程，可是，全集的编辑们在编辑时完全无视这一重要著作的存在。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为什么如此害怕马克思对沙皇制度的批判，这恐怕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

十五 对日作战留下的污点

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这一决定是在盟国之间作出的，目的是要尽快结束同日本的战争。德国和意大利失败后，当时就剩下一个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最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是美国，它希望设法避免在日本本土作战，因为那样会使美军遭受损失。而且美国政府在1941年12月日本攻击珍珠港之后不久，就已经向苏联方面提出了这一问题。斯大林是在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于莫斯科会谈时，表示同意美国的这一要求，但条件是要等到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胜利后才对日开战。苏联参战的最终条件，是在德黑兰会谈（1943年11月）后，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首脑会谈中决定下来的。

以上就是苏联对日宣战的经过。但是，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在这一行动中留下了一些污点，它既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也违背了国际公理。

第一，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谈时，作为对日参战的条件，提出了违反不扩大领土这一原则的、非法的领土要求，即“归还千岛群岛”，并且说服罗斯福和邱吉尔同意了这一要求。千岛群岛，根据幕府^①末期和明治初期日本和俄国之间签订的两项条约，已被确定为日本的领土。要求日本割让千岛群岛，

^① 幕府，指江户幕府或德川幕府，由德川家康在1603年在江户（今东京）建都成立幕府（中央政府）到1867年幕府灭亡称为江户时代或德川时代，幕府末期指1853年至1867年之间。——译者注

显然违背了同盟国庄严宣布、而且苏联本身也同意的“不扩大领土”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如果没有特别的权益，对日宣战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于是强迫美国 and 英国接受了苏联的这一要求。而且战争一结束，不等到缔结和约就采取国内立法措施，立即把千岛群岛强行划入本国领土（1946年）。战后，苏联方面拼命地寻找理由为千岛问题辩护，似乎千岛群岛在历史上本来就是苏联的领土，苏联只不过是恢复了原来就拥有的权益而已。但是，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这三十多年来提出的所有“论据”，都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去年，《真理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也发了一通议论，说千岛是日本向当时软弱无能的俄国施加压力，进行非法恐吓夺取的。但事实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是俄国向幕府末期的日本派出舰队施加压力，而不是日本派出舰队对俄国进行恐吓。今天再来谈论这种极普通的历史常识，实在是毫无意义。而且日本为了摆脱就千岛群岛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又花去了三十年的岁月。这种篡改历史的无耻议论，只能表明斯大林提出的这一领土要求，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无理的大国主义要求。

第二，斯大林把对日宣战看成是对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日俄战争采取的报复行动。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的“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了投降书。这天，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告人民书》，他在《告人民书》中是这样向人民讲的：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

但是，1904年俄日战争时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

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清洗。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四十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赋予对日战争以对日俄战争进行报复这一意义，正是把自己摆在沙皇政府的继承人的位置上。斯大林的这种立场，“同列宁的政策是不相容的”（斯大林批评恩格斯的话），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为列宁认为日俄战争是双方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他对这场战争采取的是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

1945年度的斯大林文学奖，授给了《旅顺口》这篇大作的作者斯切潘诺夫，这是从“艺术”上表明了斯大林的这种观点。《旅顺口》描写俄国军队在日俄战争中创造了英雄业绩和军方上层人物的腐败无能。

第三，日本战败后，苏联政府把日军俘虏送往西伯利亚，无视国际法，长期将他们扣留，作为劳动力使用；而且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等苏军占领区内，也多次采取了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不应采取的暴行，这是斯大林的大国主义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用半个世纪以前列宁的话来说，由斯大林本人，或者是在他的指挥下采取的这些行动和发表的主张，严重地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甚至有“勾消”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意义的危险。

十六 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 与大国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停止了自1919年成立以来开展的国际活动。这一决定，正如《日本共产党五十年》这篇文章所指出的，“这是各国一致同意后采取的措施。通过共产国际二十四年的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已经结束，而且，继续让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国际组织和国际领导机构存在，反而会成为各国政党和革命运动前进的障碍。”

但是，对于斯大林——他的大国主义在战争期间比在战前更有所发展——来说，解散共产国际的最大价值，似乎不在于解散声明中所宣布的自主和独立的原则，而在于揭穿“莫斯科”企图使别国“布尔什维克化”这一“希特勒分子的谎话”，有助于“进一步巩固盟国和其他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统一战线”。

（斯大林1943年5月28日《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战争结束后，当美国和英国在欧洲和亚洲与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势力相对抗、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时，斯大林又开始计划恢复共产国际式的国际组织。根据这一计划，1947年9月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

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组织。

第一，它不同于共产国际，这是一个由世界的共产党和工

人党中的九个欧洲国家的党(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参加的组织。

第二,它不同于共产国际,只提出了极为有限的任务:“交流经验”和在必要时采取“公认的共产党协调行动”。

但是,斯大林在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之后,立即按照苏联的方针把它改变成为对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不管它是否是成员,一律进行干预、进行大国主义干涉的机构。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不同于共产国际,它本来是以交流经验为任务的机构,并没有民主集中等规定。因此,斯大林为了能够单独操纵它,便把它变成了比共产国际更易于摆布的、更便于推行干涉主义的工具。

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最大的转折点是,以南斯拉夫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存在意见分歧为借口而“开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48年6月的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被列为议题,全面支持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指责,并且通过了一项明目张胆的干涉决议,呼吁南共党内的“健康力量”要求领导机构修改政策,否则就撤换领导,总之,是要重建一个忠实于苏联的领导班子。

继而,1949年11月的会议又称南斯拉夫共产党为“刽子手和间谍控制的党”、“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法西斯党”,并且把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斗争说成是“全世界的共产党及工人党的国际任务”。

这次会议的报告引用了斯大林二十二年前在苏联共产党的会议上的讲话,说是否无条件地服从苏联乃是考验有无国

际主义的试金石，並且竭力强调，所谓自主性或“独自的道路”，这只不过是掩盖铁托之流叛徒嘴脸的纲领。“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1927年《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于是，在同铁托主义斗争这一名义下，组织了一场否定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要求各国党在一切问题上向苏联共产党的方针和观点“看齐”的政治运动。

从此以后，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对于没有加入这一组织的共产党也发表指导性的讲话，进行干涉，而且，它沦为大国主义的机构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开始逐步走向反面。

关于日本共产党自1950年以后受到的干涉及其教训，后面再谈。通过最近同各个外国党进行的交流，我越来越感到，因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干涉而造成的损失，实际上是多方面的。

譬如印度共产党。该党在1950年1月受到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杂志的点名批评，並要求该党组织人民解放军，开展中国式的武装斗争。接着在第二年4月，党的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人交给他们一份《印度共产党纲领》，要他们同现政权全面对抗，进行中国式的解放斗争。六十年代印度共产党之所以分裂，其重要原因就是该党被迫接受了这条错误的路线（具体的请参阅1981年8月17日《赤旗报》《同印度共产党会谈——采访西泽副委员长》一文）。

另外，瑞士劳动党在1950年也受到过共产党及工人党情

报局的粗暴攻击，说该党支持本国的中立政策是丧失阶级立场。与此相呼应，认为应当抛弃中立政策、站在拥护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上的苏联追随派，进行了分裂活动。但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将他们驱逐出党，仍然坚持维护中立政策，并且从那以后向今天采取的自主立场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参阅1981年12月日本《文化评论》杂志载西泽富夫《欧洲革新力量的胎动》一文）。

象这样，在机关杂志上对没有加入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共产党突然进行单方面的攻击，将领导人召到莫斯科，在必要时扶植亲苏派，强迫接受苏联领导集团的路线——这就是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时代进行干涉的典型手法之一。

十七 五〇年问题与斯大林

所谓“五〇年问题”，就是指从1950年1月起对日本共产党的干涉，这也是以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为工具的斯大林干涉其他党的典型表现之一。

1950年1月6日，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杂志《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突然发表了一篇批评日本共产党的评论。

这篇评论指出，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含糊不清。并且说，日本共产党应当对美帝国主义作出明确的评价，清楚地表明态度。仅就这一点来说，评论向日本共产党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批评的方式是极

其粗暴的。评论点了当时是政治局委员、现任党的主席的野坂参三的名，并且对他进行了无休止的谩骂，说野坂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日本的改头换面而已”，是“欺骗日本人民群众的理论”，是“反爱国主义的理论”，等等。这种评论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建议。

斯大林在对日本共产党进行这一干涉时，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直接的合作者的，这也是个特征。在1949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国际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方式推广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看法。接着，毛泽东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年初访问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对日本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相继发表评论提出批评时，都是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

1950年6月，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利用美国占领军进行镇压的机会单方面解散了中央委员会，于是日本共产党发生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同分裂的一翼——解散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多数”派取得联系，并且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召到北京。于是，极左的、冒险主义的方针，通过这种途径传到了日本。因为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所以中国共产党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形势看成是和解放前的中国形势一样，并企图把中国式的“人民战争”路线应用于日本的革命运动。

以现任委员长的宫本显治为首的受排斥的中央委员们，主张党的统一，同时，强烈反对把武装斗争的方针搬到日本。解散中央委员会的一派，由于陷入了困境，所以也从各方面进行了反省，在国内，双方之间开始谈判，谋求统一。如果当时

不受干扰,谈判顺利进行下去,那么,“五〇年问题”就可以在
不使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的民主运动受那么大损失的情况下得
到解决。

然而,就在这时,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进行了第二次干
涉。1951年8月,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杂志又刊登
文章谈论日本问题,全面支持解散中央委员会的一派,并且谴
责谋求党的统一的一派是“分裂主义者”,凭借这种“国际权
威”一举破坏了实现统一的行动。

之所以进行第二次干涉,是因为同月在斯大林参加下于
莫斯科召开了“会议”并作出了结论。在国外的一部分日本共
产党的干部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
了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就日本共产党的党内问题作了“裁
决”,提出了断定“日本的解放和民主变革”不能依靠和平手段
的“纲领”(后来被称为五一年纲领)。这个纲领也是经斯大林
修改之后,作为最终决定强加给日本方面的。这个“五一年纲
领”,无论是从把日本的革命基本上看作是殖民地附属国型的
革命这一点来说,还是从否定靠和平手段实行变革的可能性
这一点来说,都使在这之前进入日本的极左冒险主义找到了
“纲领性”的依据。

“五〇年问题”全部经过所表明的斯大林的作法,暴露了
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即完全无视共产国际解散后共产党之间
的关系的原则等,把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当作拥有向日本
共产党发号施令的权限的国际领导机构,而且把苏联共产党
作为凌驾其他外国各党之上的事实上的老子党。

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之下,把极左冒险主义的方

针强加给日本，给日本的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日本共产党五十年》这篇文章是这样记述的：

“基于这一方针的冒险主义的活动，特别是从1951年秋到1952年7月，集中地表现了出来。这个极左冒险主义的方针，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破坏了党的组织，加之美日反动势力的镇压和党的分裂，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党因此而受到的打击之严重，突出地表现在大选中支持党的票数由1949年1月的二百九十万票减少到1952年10月的八十九万票，而1953年4月，一下减少到六十万票。1949年当时，党在众议院拥有三十六个议席，可是，由于自1950年以来占领军的不断清洗，在1952年选举时，连一个席位也没剩下。在1953年选举时，好不容易才恢复了一个议席。”

日本共产党为了克服党的分裂造成的危机，纠正由于外国干涉而形成的错误方针，按照正确的方针实现党的统一，又经过了几年的时间。1958年召开的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总结了“五〇年问题”，并从中引出了教训。在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于1957年11月发表的《关于五〇年问题》的总结文件说，1950年1月的“《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评论，在批评方法上缺乏克制和慎重态度”；1951年8月的《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报道，起了堵塞走“坚持原则的正确的统一道路”的作用等，系统地指出了外部干涉的错误。而且，作为五〇年问题的基本教训之一，再三强调了这样一点：

“不可否认，1951年8月《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评论等，就我党复杂的内部组织问题进行的片面的批评，是错误地解决分裂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在今天也是清

楚的。”

因此，对“五〇年问题”的总结，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它使日本共产党自主地担负起了对于日本革命运动的责任，并且确立了反对任何外国政党干涉的这一党的独立的立场。

十八 在霸权主义的 “保护伞”下

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成为斯大林推行大国主义干涉的机构一事，对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本来，这些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苏军击溃希特勒军队的过程中获得解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重，因国家不同而都有所差别。但是，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在苏军进驻之后开始实行社会变革的。

因而，这些国家从德国的占领统治之下获得解放，并非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后来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变革，也都是在苏军驻扎期间进行的。因此，以斯大林为中心的苏联领导机构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拥有干预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的内部问题的特权，而且实际上也是采取了行动的。另外，在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之间，也明显地存在着迎合和依赖大国的倾向，苏联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从一开始就撑着霸权主义的保护伞，严重地践踏了独立主权国家间的关系。

不甘心于无条件地保持同苏联的这种关系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回顾一下从1947年到1948年苏联同南斯拉夫走向决裂的经过，就可以充分看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南斯拉夫政府所采取的是理所当然应该采取的行动。譬如南斯拉夫的党员和官员拒绝协助苏联在南斯拉夫国内组织谍报活动的计划等“事件”，均被斯大林谴责为不能容许的“民族主义”等等。

据赫鲁晓夫说，在向南斯拉夫共产党发出谴责信时，斯大林让赫鲁晓夫看了信的抄件，并且狂妄地说：“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铁托一伙就会完蛋。铁托也就会垮台。”

同斯大林的愿望相反，南斯拉夫党既没有因为斯大林的书信，也没有因为被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开除这种集体的“制裁”而垮台。但是，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在斯大林的指示下，驱逐了南斯拉夫党，把所有独立自主倾向统统视为“铁托主义”而加以压制，这给所有东欧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这之前，东欧各国把寻求不同于苏联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时，这些国家正在建立的新体制，被统称为“人民民主主义”，但实际上是议会制民主和多党制等。人们认为，这表明，东欧国家寻求的是与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波兰的道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等这种寻求符合于各自国家的条件的“民族的道路”，被当作国家的基本方针。

但是，自从同“铁托主义”展开斗争以后，情况为之一变，谈论“民族的道路”一概被视为严重的政治犯罪。而且，不仅在国际问题上无条件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在本国的国内建设

上，也要把苏联式社会主义作为唯一的典范而加以模仿，这被看作是一项义务。

在波兰，很早就主张走“波兰的道路”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1948年9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被认为犯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罪行。同时，这次全会还指出没有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充分变成自己的经验，并且把这一点列为党的领导机构活动中存在的缺陷之一，主张应立即加以克服。

各国主张走“自己的道路”，就是在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仍被看作是最严重的犯罪。1949年，苏联的杂志和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批评走“自己的道路”，这些文章说：“各人民民主国家，决不存在比苏联已经达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更新的道路和其他不同的道路”；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等等。如果根据这种新的“原则性的”见解，那么，“人民民主各国”同苏联之间存在的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落后阶段同先进阶段的差别，而怎样接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且与之一致起来，就成了衡量社会主义是否前进了的尺度。

斯大林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事安排更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干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1949年11月，由斯大林派到波兰的罗科索夫斯基，身兼国防部长、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等政府和党的要职，并且把波兰军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虽说罗科索夫斯基是波兰人，但他是有名望的苏联红军的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作为白俄罗斯前线的第一指挥官负责指挥进攻波兰。

斯大林对一切自主倾向都进行政治谴责，使提倡走“民族道路”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感到满足。他为了建立苏联的霸权主义体制，从战前三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向东欧各国兜售大批镇压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苏联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而经常采用的。

这种办法极其简单。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断定为“间谍和杀人犯的党徒”、“帝国主义的走狗”等，而且，有鉴于此，无论是谁，只要被证明他同南斯拉夫有某种“特殊的”关系，那么，都可以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由于南斯拉夫党在不久前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有影响的政党，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的有影响的领导人几乎都同南斯拉夫有过某种关系。

用这种办法审判了许多人，譬如：1949年9月审判拉伊克（匈牙利），同年12月审判科斯托夫（保加利亚），1952年11月审判斯兰斯基（捷克斯洛伐克）等等，凡是斯大林等人想要当成“靶子”的人，不管是谁，都要一个接一个地被当作“潜人的间谍分子”揭发出来，并被除掉。继审判斯兰斯基之后，波兰还开始准备对自1951年以来被逮捕入狱的哥穆尔卡进行审判。后来，只是由于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才没有进行。

这样一来，在斯大林大国主义保护伞下建立起来的东欧的政治体制，更加剧了执政者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恐怕是不难理解的。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形成的以特权阶层为中心的“官僚主义”向东欧的“输出”，更是有了恶性发展。这是因为，正如西泽副委员长去年12月25日在《赤旗报》上所指出的，一旦“社会主义大国的霸权主义同国家领导机构

缺乏自主性”结合在一起，“那个国家的执政者就不会去注意本国的人民大众，而仅仅是把注意力放在‘保护人’的一举一动上”。

自斯大林建立了对东欧的霸权主义体制以来，即使从斯大林去世以后的时期算起，到今天也已经有二十九年了。在遒期间，东欧国家的历史，无论是在对外政策上还是在国内政策上，都有自己的创见，不加区别地用同样的话来谈论这些国家今天的情况，是不科学的。但是，从四十年代后半期到五十年代前半期，这些国家在最初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都被纳入了以斯大林为中心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体制之内，无视这一事实及其重大影响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现实，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在批评波兰的军事独裁时，之所以不仅注意导致最近危机状况的经过，而且也注意把这个国家历代的当权人物的官僚主义、腐败无能和缺乏自主性等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是这个缘故。

十九 斯大林之死及对他的批判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死后，领导班子经过一系列的变更和改组，组成了一个以赫鲁晓夫为中心的党政领导班子，并对斯大林时代的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然而，那种纠正是极不彻底的，而

且，有时名曰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实则陷入了另一种错误之中。

特别是对斯大林在国际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犯的大国主义错误，除了极少部分的例外，几乎没有进行任何自我批评。

所谓部分的例外，一个是指赫鲁晓夫1955年访问南斯拉夫，公开宣称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过去对南斯拉夫的谴责是根据“钻入我们党内的可憎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的敌人伪造的材料”进行的。

另一个是指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1956年2月)谴责对苏联国内少数民族实行的民族惩罚政策。但是，这是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讲的，虽然这个《秘密报告》已为世人所知，可是，苏联至今仍然没有公开发表，确实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报告。

除此之外，也有过一些零星的修正。封存了三十多年的列宁批评斯大林的书信和便笺首次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1956年第9期)上，接着又收录于《列宁全集》中，这就是其中一例。但是，曾经受到列宁批判的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三十年来贯穿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和民族政策中，而没有按照列宁规定的准则进行重新检查。列宁患重病时在病榻上倾注心血写成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便笺。苏联的当事者们从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也仅仅是在收录了这篇著作的《列宁全集》的补遗中加了这样一个注：

“列宁的这封信，曾经在1923年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的领导人会议上宣读过。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即以

列宁的指示为基础。”（《列宁全集》第30卷第758页）

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期间，苏联、波兰、意大利、保加利亚和芬兰五党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撤销战前解散波兰共产党决议（1938年）。这个联合声明也只是说，当时对波兰共产党提出的“怀疑”，“现在已经查明，那是根据后来被揭发出来的挑拨者们伪造的证据而提出的”，而对于采取这一犯罪措施的真正负有责任的人及其动机却只字未提。

臭名昭著的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也于1956年4月发表声明宣布解散了。但是，那个声明在高度评价了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在消除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之间产生的涣散状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有助于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加强各兄弟党的建设”之后，仅仅说，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由于已不适应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产生的“新条件”，所以决定解散。在那个声明中，莫说对与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存在和活动相关的大国主义的危害作出负责的总结，就连一点批评性的话都没有。

在与我党的关系中也是这样，关于给日本革命造成莫大损失的“五〇年问题”中的大国主义干涉，苏联共产党领导在事后仍继续“佯装完全不知”。岂止如此，在1964年4月18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对于当时强加的极左冒险主义方针甚至强词夺理地说什么“与苏联共产党任何人都无关”，“试图把1950—51年日本共产党内发生的事件的责任推到苏联共产党身上是毫无根据的”。

对于这件事，中国党的领导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走上大国主义干涉道路以前却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官本委

·员长(当时任总书记)1967年把继续佯装完全不知的苏联的态度与中国的这种态度加以对比,发表了如下的讲话(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对日本共产党进行干涉主义的攻击了):

“1959年,在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途中,以我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在会谈中谈到了我党1950年的问题,坦率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当时对日本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有错误的。对方主动地承认,当时对党进行了内部干涉。他还说,关于五一年纲领的问题,主要是斯大林起了指导性作用,尽管存在这些事实,中国共产党赞同这件事也是不正确的。当时,有关五〇年问题,我们主要作为日本共产党自身的问题作了处理,避免使与外国党的关系问题表面化。然而,在苏联共产党完全假装不知道这个问题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如此坦率地承认错误的讲话,确实是光明正大的态度,当时我们也感铭肺腑。”(1967年7月《自主独立的十年》,收录于《新日本的道路(1)》一书)

必须指出,完全回避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的批判和反省,表明了今天的苏联领导“批判”斯大林的限度,同时,正是在大国主义的问题上,反映出他们确确实实是斯大林的继承人。

二十 首先举起独立自主旗帜

日本共产党在1958年召开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五

〇年问题从根本上作了总结,恢复了党的统一,同时,确立了独立自主路线。日本共产党对于包括与苏联的关系在内的各种国际问题一贯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待的。

首先是领土问题。1959年1至2月,日本共产党第一次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团长宫本显治总书记(当时的职务)在与苏联方面会谈时提到了千岛问题,光明磊落地主张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在第一次正式访苏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提出的领土问题,苏联方面也好象是措手不及的样子,但是,由于日本共产党据理力争,苏方也无法坚持“已经解决”等说法,不得不保证说,有关择捉、国后的南千岛,不能永远保持现状,将来日本如果建立了民主的政府,苏联将采取“新的态度”。这一情况虽然通过会谈纪要确定下来了,但是,这里所说的将来的“新的态度”,是指在日本建立起人民民主政府,不用再担心千岛会被用作对外发动攻击的军事基地时,把择捉、国后归还日本。

在日本的政党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把领土问题的谈判推进到如此地步的政党还是绝无仅有的。

日本共产党在那之后还对千岛问题全面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69年,根据这些研究发表了对千岛政策。这项政策的核心在于,明确地指出了在战争时期,美、英、苏三国决定把千岛划归苏联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2月)“是不合理的处理,也不符合‘不扩张领土’的原则”,要求苏联不仅要归还南千岛,而且要归还包括北千岛在内的整个千岛群岛。

这项政策的基本观点是,在日苏领土问题方面,也要清除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结果。这是后来日本共

产党始终坚持的毫不动摇的立场，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深刻的注意。

前些日子，《赤旗报》的特派记者绪方靖夫从巴黎寄来了一篇通讯，题为《从欧洲看日本共产党》（刊载于1月8日、9日）。在欧洲，许多一般报纸和杂志都很注意日本共产党采取的独立自主路线。例如，法国的具有代表性的日报之一《世界报》就是这样。这家报纸特别重视日本共产党对苏联的战后处理“提出的异议”，并且写道，日共“是坚决要求苏联归还领土的爱国的党”，还评论说：“共产党早在二十年前就向苏联提出了领土问题，这足以证明其独立性。”

在正确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日本共产党的立场也是走在最前面的。

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曾经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同年10月，由二十六国的代表举行了预备会议（起草委员会），在准备了声明的草案的基础上，于12月召开了全体会议，八十一国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莫斯科会议。

当时，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虽然已经解散了四年多了，但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尚未作为一项公认的原则而正式得到承认，世界大多数的党不是属于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一边，就是属于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一边，而这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倾向是相当根深蒂固的。

在那个时候，即使是与苏联展开大规模论战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在三年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国际会议上说“团结必须有一个头”，高度赞扬了以苏联为中心的团结。

“莫斯科会议指出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中心的作用，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团结必须有一个中心，必须有一个头。”（《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5日社论）

日本共产党由于刚刚通过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恢复了统一，在人数方面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党。例如，在国会议员方面也是这样，在举行预备会议的时候，众参两院的议员加在一起才有四名。但是，日本共产党从参加预备会议开始，就为不容许推行任何大国主义，把确立真正独立和平等的关系作为衡量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准则而进行了奋斗。

这次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中有这样两段话：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

“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

这个文件中所阐明的各国共产党关于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决定，是日本共产党在预备会议中积极主张的，并为各国党共同确认为准则。

日本共产党在预备会议中极力主张的问题之一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在现阶段，不容许设立共产国际那样的民主集中制的国际组织，即设立由一个国际性中心指导世界革命运动那样的中心站。”

代表日本共产党参加了预备会议的宫本委员长（现职）后来谈到日本共产党这样的主张和努力引起的国际反响时说：

“预备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也出席了为各国代表举

行的告别宴会，他在宴会上一面看着我一面说，听说日本共产党的代表担心会再次出现共产国际那种状态，可我们自己却没有那样的打算。另外，我们还强调，各国党不论大小，都享有独立平等的权利，因此，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不应当根据多数同意作决定，而必须全体一致同意才能作决定。对于这点，一部分党反驳了我党，但我们强调，为了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而没有妥协。”（1967年7月《自主独立的十年》，收录于《新日本的道路（1）》一书）

赫鲁晓夫尽管说了些挖苦的话，却没能够反对独立平等这项原则本身。正因为这样，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才不得不同意把这项原则作为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准则。但是，这种同意仅仅是口头上的，在其实际行动和观点中，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并未得到清算，在那次国际会议之后，在与我党的交往中也立刻得到了证实。

二十一 大国主义的攻击开始了

在召开国际会议的第二年即1961年的10月，苏联领导人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开始发动斯大林大国主义的攻击。在会上作报告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以不同意苏联的意见为理由，对阿尔巴尼亚党开始了单方面的攻击。不少的党在那种场合中都随声附和，摆开了谴责阿尔巴尼亚的联合阵线。然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是野坂参三主席）理

所当然地没有加入苏联一手组织的这场谴责运动。

谴责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是从第二年1962年12月到1963年初在欧洲各党的一系列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日本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这一运动。

日本共产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如果从1960年国际会议上所确认的原则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这似乎是不可容忍的。尽管是国际会议上确认的原则，但是苏联共产党这些认为掌握了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权的大国主义者，对日本共产党的作法是不满意的。因为日本共产党对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论战也好，对苏联和中国的论战也好，都没有采取无条件地支持苏联的态度，而把参加论战的双方的文件都刊登在党的杂志上，以便使党员能够冷静地、客观地研究论战的内容。因此，从1962年开始，苏联共产党便煞有介事地利用这个问题对日本共产党进行指责。

1963年7月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候，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的胃口更大了。苏联领导人这时突然改变了过去一直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方针，而与美、英两国缔结了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然而，这正中美国肯尼迪政府的下怀，因为美国正在推行“接近苏联”的战略。于是，就在赫鲁晓夫讴歌“美苏共处”的新时代之际，美国有条不紊地做好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准备，这已是昭然若揭的历史事实。

但是，苏联领导人不只把“美苏接近”路线作为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还要求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和平民主运动都采取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苏接近”路线的立场。当然，

日本共产党没有接受这种要求，而表明了不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而且，条约签订后不久召开的第九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对这个条约采取了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立场，呼吁一切和平力量应该为禁止核武器、禁止核试验的基本任务而团结起来。代表苏联和平委员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茹科夫在大会上顺应形势，同意了大会决议，但是在回国后，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文章，指责“若干日本共产党员”在这次大会上的活动。这篇文章就是攻击日本共产党的第一枪。这篇文章也表明了苏联共产党支持分裂派借口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而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行径。

对于大国主义者来说，突然改变对外政策是他们自己的当然权利。但是，无论怎么改变，难道能说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的对外政策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与和平民主运动的首要义务吗？这和斯大林要求全世界无条件地支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大国主义的逻辑。

日本共产党痛斥了这种复活斯大林的大国主义的行径。苏联领导人对此的反应就象斯大林曾经对南斯拉夫党所做的那样，想以搞独立自主的罪名把日本共产党“开除”。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4年4月写信给日本共产党。信中说什么由于苏联的强大，“帝国主义者已失去了推行‘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同意各国和平共处”等等，再次宣扬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赤裸裸地要求日本共产党接受苏联的这些看法和政策。苏联领导人在这封信中对美国的美化，被几个月后开始的侵越战争无情地粉碎了。1964年8月，在肯尼迪之后上台的美国约翰逊政府制造了“北

部湾事件”，并以这一事件为借口，点燃了进攻社会主义越南的战火。

但是，苏联领导人并没有预感到自己的立场会陷于这种境地，而是以不赞成苏联的看法和政策为主要理由，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异乎寻常的谴责，说什么“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呀，什么“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呀，什么“背离日本的进步事业”呀，甚至说什么“是热核战争的鼓吹者”等等，其罪名真是应有尽有。

这种作法好象自己是站在各国共产党之上的审判官，为所欲为，而把日本共产党当作一个越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轨道的党来加以指控。斯大林通过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搞过的那一套，现在又由苏联共产党再现了。

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在日本共产党内组织里通苏联的派别，并且给予这个派别一切援助，企图以此来颠覆日本共产党实行独立自主的领导班子，即使这个目的达不到也要分裂日本共产党，拼凑一个亲苏派的“党”。当时，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就是按照苏联的计划主动地充当内奸角色的人物。

二十二 维护党的“主权”

志贺、铃木一伙选择1964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批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议案的时刻作为采取行动的时机，违背党的决定，在国会全体会议上投了赞成票，同时，从追随苏联的立场

出发,发表了指责日本共产党的声明,并且叫嚷要纠集他们的“同志”。但是,只有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等发出了热烈的共鸣,而在日本国内,在党内外,根本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日本共产党在此之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坚决地把两个反党分裂主义分子开除出党。

志贺一伙于同年7月发行了一份叫做《日本之声》的反党机关报,把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作为最好的“证据”,企图把形形色色的反党分子全部纠集在一起,以便结成“亲苏派新党”。假如这一企图得逞,就可以使这个“亲苏派新党”取代已被“开除”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的日本共产党,占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席位。这就是干涉者和内奸的合谋。

苏联领导机构在志贺等人结成反党组织之前,就单方面地发表了四月份的那封把日本共产党攻击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信,为志贺一伙进行反党活动提供了“纲领”。而且,志贺一伙立即拜倒在苏联脚下,发行了把追随苏联作为最重要使命的机关报《日本之声》。在创刊的第二天,《真理报》(1964年7月16日)便立即作了大量介绍,并且还配有照片,大肆吹捧说什么:“爱国者、人民的忠实儿子、国际主义者、献身于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战斗家的斗争性机关报诞生了!”但是,来自大海彼岸的大国主义者方面的最高级赞赏也等于济于事,分裂分子的企图最后仍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

当然,想要仿效斯大林“开除”日本共产党的企图在国际上也未能取得成功。高举独立自主旗帜的日本共产党的斗争得到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同情,相反,大国主义者方面倒加剧了矛盾。不过,这段历史我们就不再详细地加以回顾

了。在这里，必须指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自1964年以来，苏联领导机构一直进行干涉主义的攻击，企图把自己的想法和方针强加给日本的革命运动与和平民主运动，在日本共产党内组织内奸派别，并通过它颠覆日本共产党。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进攻，它建立自己的走狗集团，解散别国共产党，同时也是一种“殖民主义”的表现，它想要通过这个内奸集团把别国的运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这种干涉主义，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要保卫日本革命运动与和平民主运动的自主性以及日本共产党的“主权”，这是个一步也不能退让的问题。

日本共产党从苏联领导人利用反党分裂主义者进行干涉主义的攻击时起，一贯采取这一原则性的态度。

在当时开始进行干涉时的负责人赫鲁晓夫1964年秋季下台以后，应苏联方面的要求，于1968年1至2月在东京举行两党会谈，苏联方面建议恢复两党关系。此后，虽有过曲折，但日本共产党坚持主张，只要苏联方面不公开清算支持反党分裂主义者的干涉性的错误，两党关系就不可能恢复正常。日本共产党根本没有妥协，也没有采取暧昧的态度或者大事化小的态度。

结果，1979年在东京和莫斯科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苏联共产党的代表表明：（一）苏联共产党认为日本共产党是代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的政党；（二）苏联方面和打着任何旗号的反党集团的活动不发生任何关系。同时，苏联共产党的代表还公开表示对过去的干涉行为进行反省，说“过去，真

理报》登了支持志贺一派的文章是不对的。”而且，同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日苏两党首脑会谈时，苏方又重申了这一态度，并在此前提下就两党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

整整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才使苏联领导人承认犯了干涉主义的错误。在这十五年期间，日本共产党对苏联的干涉主义的攻击一步也没有退让，并且在坚持原则方面取得了胜利，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承认日本共产党名副其实地走在了前面。

前年2月举行的日本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重申了这一行动的意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曾发生过不少干涉问题，而这次日苏两党会谈对干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在这一历史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最坚持原则的，最彻底的解决。确凿的事实证明日本共产党对外国势力的非法干涉采取了坚持原则的态度。”（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日本共产党在同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中，确实是站在了斗争的第一线，这样说既不过分，也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自吹自擂。

中国领导人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和苏联一样，进行了大国主义干涉。然而，日本共产党对此也采取了同样坚持原则的态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反击。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的那样，“日本共产党的历史是与外部干涉进行斗争的历史。”（塔方记者报道）可以说，日本共产党的这种独立自主的立场经受了历史的种种考验。

当然，不言而喻，1979年日苏两党所达成的协议，并不意

味着苏联方面承认了两党关系中自1964年以来出现的干涉主义，同苏联大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已成过去。这一点已由苏联领导人采用军事力量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所证明。在苏联领导人1968年要求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的同一年，苏联军队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是最严重的霸权主义的行径。1979年和1981年又先后在阿富汗和波兰采取了干涉主义的暴行。

二十三 华约军队入侵

捷克斯洛伐克

在捷克斯洛伐克，自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要求摆脱斯大林时代强加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争取建立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的运动有所高涨。在这种全民性的潮流的背景下，于1968年初，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更替。也就是说，在一月份举行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改组了领导机构，自1953年以来一直担任第一书记职务的诺沃提尼辞职，杜布切克被选为第一书记，接着于同年三月，诺沃提尼又辞去总统职务，国民议会推选斯沃博达任新总统。

这样成立的新领导机构，举起“通向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的旗帜，与国内的运动相呼应，有意识地追求以扩大民主和自由为特征的独自の社会主义道路，并以此作为党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中央委员会四月份召开的全体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就是这种行动的纲领性宣言。

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始的这场改革运动，对于一直把

苏联式社会主义作为唯一典范强加给别国的苏联领导人来说，是难以容许的。苏联领导人通过外交谈判或者在《真理报》上进行攻击，施加种种压力。尽管如此，也未能达到目的。于是，苏联就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拉到自己一边，在国际上谴责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威胁“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共同的安全保障。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五国的党于7月15日致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所谓“华约五国联名信”就是其中一部分。这封信是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等五国的党首脑于7月14日在波兰会晤时，作为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结论而拟定的。联名信不仅随意地把正在搞改革运动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武断地称为“社会主义面临崩溃的危机”，而且，还借口这种危机不光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共同体”所有党和国家的共同问题，力图使自己的“干涉”合法化。联名信还公然威胁说：

“我们确信，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对社会主义基础的威胁，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产生了将威胁共同的重要利益的形势。面对这样的危险，假如我们漠不关心或者不予以警惕，那么，我们国家的人民恐怕是决不会容许我们的。”

这封联名信成了臭名昭著的“有限主权论”的第一个宣言。7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立即对这封联名信发出了反驳声明。接着，又通过捷苏两党会谈（7月25日—8月1日在切尔纳举行）和华约组织六个成员国的党代表会议（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等，按同样的方针施加了集体压力。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的情况复杂，一方面具有反对

“大国主义，争取推行捷克斯洛伐克的自主路线的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具有坚持赫鲁晓夫之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一面。对此，日本共产党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地采取了这样的基本观点：即使那里存在任何路线方面的问题，但那也是应该由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和人民自己解决的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19日向正在抵抗苏联等集体压力，为维护自己的自主而斗争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出了一封鼓励性的电报。电报说：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确信，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问题，只能在贵党的积极领导下，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己来解决。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党，对于本国的具体形势，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项原则，自主地制定政策和实行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任何党也没有权利对其他兄弟党的内部问题进行干涉。”

苏联领导人在知道施加压力无效后便决定诉诸军事干预这一侵略手段。8月20日，悍然采取了由华约组织五个成员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空前的大国主义暴行。

这天深夜，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五国的军队，突然越过边界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并进击首都布拉格，包围共产党总部、政府、国民议会、广播电台等，逮捕了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联邦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领导人，并且把他们绑架到了苏联。

苏联塔斯社第二天宣称，这五国军队的侵入是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请求进行的。这完

全是谎言。当苏联等国的军队越过边界的时候，布拉格的党总部从下午起就在召开主席团会议，就预定9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政治局立即拟定并通过了向人民说明事实真相的声明。可是，里通干涉者的亲苏派却反对这一声明，最后以七对四的多数通过，并决定第二天21日黎明立即通过广播电台告诉人民。那些里通干涉者的分子虽然控制了广播电台，企图阻止广播这一声明，但是，声明还是通过备用线路广播了。这个声明言简意赅，揭露了苏联等国进行军事侵略的本质。

“一、昨天，也就是1968年8月20日晚上11时，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及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边界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这件事情是在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总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以及这些机构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这一行动不仅违背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切原则，而且也否定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告人民书指控苏联等国的行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采取的侵略行为”。接着，政府向入侵的五国递交了备忘录，通告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一切合法机构，都决不同意对捷克的侵略与占领”，谴责了五国的侵略行径。而且，利用可能采取的手段将告全国人民书和备忘录转告驻各国的外交机构。在日本，捷克驻日大使馆也立

即予以公布。

二十四 为使干涉“合法化”

要尽阴谋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的声明，应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请求这一谎言立刻被揭穿了。于是，苏联领导人改变了战术，在8月22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份名曰党中央委员会、政府部门和联邦议会议员的“一部分人”的呼吁书，自我表白说是他们自己作出的“请求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支援的历史性决定”，想用这种办法消除驴唇不对马嘴的矛盾。

这个“声明”的文件恐怕是事先准备好的。按照苏联当初的计划，是在闪电般地逮捕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后，发表一个正式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的人的声明，并准备采取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请求而出兵的方式。由于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所以就仓惶改为“一部人”签名而已，虽然登在了《真理报》上，但这个花招也彻底地失败了。

即便存在这“一部人”，他们也没有取代党和政府，呼吁外国军队采取行动的权限，并且，如果他们背着党和政府采取了这种行动的话，那就自行暴露了他们自己是出卖党和人民的卖国的内奸。因此，虽然《真理报》本身大张旗鼓地发表了这“一部人”的声明，但是，时至今日，始终不能公布获得内奸“荣誉”的人的姓名。

苏联在用坦克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主权、逮捕绑架了党政领导人后，接着便要按照苏联的意愿炮制新的“政权”。以亲苏派为中心确定新政府的人选，自称这是在紧急情况下的“革命政府”，并且用追认苏联等国的行动的办法，给这次军事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这就是干涉者的下一步计划。然而，这一企图也因8月22日夜晚斯沃博达总统拒绝承认新政府而破产了。

而且，就在8月22日这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党违背占领军的意志，在布拉格的一家工厂里秘密地举行了第十四次临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一项声明，承认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杜布切克为唯一合法的政治领导班子，而不承认军事管制和“以占领军的力量为后盾的国内占领合作者的权力”。这项声明也使占领者的计划遭到了打击。

随着这种事态的进展，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改变计划。苏联领导人改变了策略，让理应由“革命法庭”判罪的“嫌疑犯”被逮捕绑架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形式上又“恢复”了其党政领导人的权力，并同他们进行“谈判”，以此使侵略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径“合法化”。

斯姆尔科夫斯基死后发表的《回忆录》，生动而具体地描写了苏联领导人任意摆布人的蛮横做法。苏联领导人强迫拥有主权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按照他们自己的不断变更的计划，时而扮演反革命的囚犯，时而扮演一国的形式上的“代表”。

据《回忆录》说，8月22日凌晨，乘坐坦克和装甲车到达布拉格的苏军伞兵部队占领了党中央委员会，逮捕了斯姆尔科

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并切断了全部电话线，以断绝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当时，一名跟随着苏军的内奸宣布说，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可能在两小时之内被押送到“革命法庭”。在这个阶段，曾经预定由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政权”组织的“革命法庭”来审判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并以“反革命”政治犯的罪名判决他们。

可是，这个“革命法庭”并没有开庭审判，21日夜，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苏联的军用飞机送到了苏联境内喀尔巴阡山的战俘收容所。这是一座周围设有铁丝网并架着机关枪的收容所，斯姆尔科夫斯基在这里见到了比他先一步被关进的切尔尼克，然而杜布切克却被关进了另外一座收容所。就这样，一个国家的党、政府和议会的最高负责人竟被粗暴地作为苏军的俘虏绑架到国外，被当作囚犯监禁起来了。

从8月22日中午开始，对这些囚犯的待遇出现了变化。而且，在这天下午，切尔尼克和杜布切克被送到了莫斯科，接着，斯姆尔科夫斯基也于24日被送到了莫斯科。斯姆尔科夫斯基到了莫斯科后被带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室，等待在这里的是勃列日涅夫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告诉他们布拉格正在召开党代表大会。然后又通知他们，苏捷谈判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谈判结束后，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大概就可以回国了。斯姆尔科夫斯基对此反问道：“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不是囚犯了，而又重新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了，对吗？”

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开始宣布说，从8月23日起举行“苏捷第一次莫斯科谈判”。虽说在形式上突然被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代表”，但在实质上，被苏军绑架到国外的“囚犯”

的处境并没有改变。因此，在囚犯和收容所当局之间是不会进行对等的谈判的。

通过这次“谈判”，斯沃博达、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对苏联的军事干涉被迫在事后予以同意，并以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的名义赞成发表美化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公报。而且，在这次会谈中，还迫使他们以秘密协议的形式，保证使第十四次临时党代表大会无效并实行符合苏联方面意愿的国内政策。

据参加这次“谈判”的人回忆说，苏联方面为了论证对捷克斯洛伐克拥有进行军事干涉的权利，甚至引用了美苏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处理的协定。这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就暴露了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和斯大林一样，是把战后处理的协定视为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

接着，在10月进行了“第二次莫斯科谈判”。根据这次谈判的结论，10月16日在被占领的布拉格签定了使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合法化的《临时驻军协定》。于是，在暴力面前向干涉者投降，并为干涉者占领的合法化起了作用之后，斯姆尔科夫斯基、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等人在后来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被相继赶出了党政领导班子。

苏联方面利用这项《协定》，大肆宣传苏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任意占领别国、逮捕其领导人、凭借暴力把非法的《协定》强加给别国领导人而不追究其侵略和占领的罪行，那么任何帝国主义者和任何侵略者的侵略行为就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不受追究了。

日本共产党在这项《协定》公布的时候，提出了批评，指出

这是企图通过这项《协定》使军事占领合法化的欺骗伎俩，并敦促干涉者回忆一下列宁的话。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通过强加给芬兰的《协议》，想使从帝俄时代继承下来的对芬兰的并吞合法化的时候，列宁为了戳穿这一骗局而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批评文章。文章说：

“只有双方平等才能达成协议。要使协议真正成为协议，不致成为统治的掩饰物，双方就必须有真正的平等，即俄国和芬兰都有拒绝协议的权利。这是昭然若揭、十分明显的事情。”（《列宁全集》第24卷第304页）

列宁五十年前针对资产阶级政府并吞芬兰的政策提出的批评，完全适用于苏联政府企图通过把占领下签订的《协定》强加于捷克斯洛伐克，使非法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合法化的“并吞”的政策。这一点，任何人都不难理解。

二十五 军事集团是霸权主义的工具

在苏联的指挥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行使武力推翻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是1968年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问题所在。在军事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共产党立即发表了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事态》，对军事介入的行为进行了批判。10月又发表了题为《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和拥护科学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严厉地谴责了苏联等国的侵略行为。

并引用列宁的遗嘱详细地剖析，指出这种行径继承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日美从而更高地举起了同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向歧途的致命错误——大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旗帜。

在此我们不想重复当时对此进行批判的全部论点，但是，从其后苏联的霸权主义发展来看，特别有必要引起重视的是：华沙条约组织这个军事集团被当成使军事干涉合法化的工具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

众所周知，缔结华沙条约是为对抗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军事同盟而采取的措施，那是1955年5月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八国缔结的军事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是当加盟国遭到武装进攻时采取联合防御的行动。条约在第十一条中写明，当“在欧洲建立了集体安全体系”的时候，条约立即失效；还写明，在欧洲消除所有的军事集团，是加盟国应该不断努力的目标。

第二年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各国开始对斯大林时代建立的大国主义的干涉体制公开进行批判。这时，苏联发表了一个政府宣言，说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关系应该遵循“彻底平等、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各项原则”（1956年10月30日）。关于根据华沙条约苏联军队驻扎其他国家的问题（当时仅驻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也公开声明要重新研究。但是，后来苏联只从罗马尼亚撤走了驻军，对其他国家并未履行这个声明。不仅如此，1968年以后，甚至又派兵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据华沙条约，苏联向东欧派出的驻军更多、更制度化了。

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和华沙条约的关系来看,1968年,除五国军队采取的侵略行动以外,并不存在任何“武装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因此,如果正确地执行华沙条约的规定,那就不能利用这个条约使军事干涉合法化。可是,苏联领导人却毫无根据地认定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成果将丢失的现实威胁”,并把这个“威胁”同华沙条约中规定的“联合防御”对象——外部的“武装进攻”等同起来了。根据这两个谬论便说要执行华沙条约第四条——在遭到武装进攻时采取联合防御的行动,派五国军队强行发动了军事侵略。

苏联领导人以军事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为开端,又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有限主权论”,即是说,对于参加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国家来说,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企图给它的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找理论根据,而此同时,华沙条约这个军事集团的存在,便在国际法上为这种理论提供了基础。

如果按照苏联对华沙条约的解释,那就是,不管哪个加盟国,如果出现了不合苏联意的潮流或倾向,并且苏联认为是“反革命”的话,不管那个国家的党和政府如何考虑,都要对那种潮流或倾向进行镇压。华沙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就是要求这样做的。另外,如果苏联认定那个国家的党和政府没有充分履行这个“义务”,那么苏联就有权借口有“反革命”或者捍卫“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而用军队推翻那个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换上忠于苏联的新领导。

实际上,苏联和军事介入的赞同者为了给这种极端粗暴

的行使武力的行为寻找根据，早就在鼓吹这样的逻辑了，是否允许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阴谋得逞，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也是集结在华沙条约组织中各国的“共同义务”。进行干涉的最后通牒——华沙条约五国的联名信（1968年7月16日）这样写道：

“我们不能同意敌对势力制造威胁，使你们的国家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共同体中脱离出去。防止发生这种事态，这不仅是你们的义务，而且是以同盟、合作和友情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所有共产党、工人党的共同义务。……是集结在华沙条约组织中的我们各国的共同义务。”

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治局的答复所表明的那样，捷克的党和政府从没有考虑过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及“社会主义共同体”等问题，因此，这不过是一种借口。更严重的是，这封信公然采取了如下立场：彻底否认有脱离军事集团的权利，如果哪个国家稍流露出此种想法，那么行使武力粉碎这种企图是苏联等华沙条约组织加盟国的当然权利。

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属于特定的军事集团，是留在军事集团内还是脱离出去，这都应由那个国家的人民决定，是人民的主权。1922年，苏联建立联盟时，根据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的决议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脱离‘联盟’的权利”。1922年12月签订的《关于结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中强调了这一点（第二十六条），而且在今天的苏联宪法中也写明了这一点。

“第七十二条 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

联的权利。”

承认分离权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的试金石，这当然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否认这种权利的干涉者，难道允许从苏维埃联盟中脱离出去，而不允许有脱离军事集团的权利吗？必须强调指出，那种所谓因为有脱离军事集团的“危险”所以用军事介入的方式来阻止这种“危险”是“共同的义务”等论调，其本身就是根本否认民族自决权的逻辑，这是与列宁的见解及国际民主的原则毫无相似之处的，是霸权主义逻辑。

苏联把华沙条约当作国际法上的唯一根据，最粗暴地践踏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强行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实，就是用坦克和刺刀证明了这一点；华沙条约已经大大越出了当初宣布的“联合防御”条约的性质，已变成了把苏联的意志和政策强加给其他加盟国，在必要的时候使军事干涉合法化的霸权主义的工具。

二十六 塔拉基、阿明、卡尔迈勒

在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十二年之后，苏联又以侵略的同样手法对南面毗邻的阿富汗发动了侵略。

阿富汗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它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华沙条约的加盟国。在1978年4月的所谓“四月革命”中，建立了以实行民族民主革命为纲领的人民民主党政权。当年12月，同苏联缔结了“阿苏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但这并不是

军事同盟条约，而且还在第五条中特意强调要尊重阿富汗的不结盟政策。

可是，苏联为了通过人民民主党政权，把阿富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四月革命”后不久便开始不断地系统地做工作，其中也包括施展了许多阴谋手段。人民民主党以前就存在派系斗争，掌政之后，这种斗争几经表面化，而每次都有苏联在后面插手。

斗争第一次表面化是“四月革命”后不久的1978年6月，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塔拉基)的副主席卡尔迈勒被解职，其后他逃亡到国外，人民民主党又以“背叛党、国家和革命”为理由把他开除了(1978年11月公布了这个事件)。在那以后，卡尔迈勒与当时以同样方式逃亡的其他几个观点一致的人便在国外投入了苏联等的保护伞之下，作为阿富汗的“志贺派”等待时机的到来。这是确实的。

第二次是1979年9月枪杀塔拉基事件。从1979年3月以后，一直在塔拉基手下任总理的阿明枪杀了塔拉基，由一人兼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人民民主党总书记。

这个事件也是因苏联介入引起的。塔拉基主席当时追随苏联的态度日益明显，身为总理的阿明并不同意塔拉基这种态度，对于苏联来说，阿明已经成了障碍。参加了在古巴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塔拉基归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商量了阴谋排除阿明的计划(会谈是9月8日进行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就会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听从苏联指挥的政权，然而，事态的发展与苏联领导人策划的完全相反。

9月中旬由莫斯科返回阿富汗的塔拉基劝告阿明辞去公职，遭到阿明的拒绝，塔拉基又企图把阿明杀掉。可是这个阴谋败露，阿明反过来把塔拉基打倒了。这就是“九月政变”。参加杀害阿明阴谋的四名内阁成员在失败后仓皇失措地逃进苏联大使馆，要求保护。

这样，在莫斯科策划的1979年9月的政变计划，以对苏联最为不利的结果而告终，想要排除的阿明反而掌握了阿富汗党、政、军的所有实权。

阿明要求引渡逃进苏联大使馆的那四个人，但是苏联拒绝，继续对四人实行保护。这些里通苏联的阴谋者在后一个阶段，成了建立傀儡政权的一部分“人员”。实际上，其中一人在其后建立卡尔迈勒政权时当了副总理。

第三次干涉是在1979年12月苏联直接行使武力。苏联12月下旬开始肆无忌惮地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运进大规模的兵员和武器。据有关人士证实，阿明总理12月27日对此提出了抗议，声明这是违反条约的行动，并准备通过电台和电视呼吁国民要求苏联军队立即撤回苏联境内。但是，苏联军队就在那一天采取了行动，下午七时许，空运的一万名伞兵袭击了阿明总理所在的喀布尔郊外的达拉拉曼王宫，同阿明的警卫部队展开了激战，阿明被杀害了。其他的内阁成员及高级官员那天晚上应邀参加了苏联方面主持的招待会，他们集中在那里，被全部逮捕。就这样，阿明政权被苏联发动的政变推翻了。

苏联领导人准备了一个人，让他取代阿明执权，当傀儡政权的首脑。这个人就是从前一年起一直处于苏联庇护下的卡

尔迈勒。但是卡尔迈勒没有来得及在政变当时回国，因此，苏联把录有卡尔迈勒讲话的录音磁带用飞机运往喀布尔，然后通过电台把录音广播出去，好象卡尔迈勒一开始就在阿富汗国内似的。实际上，卡尔迈勒是政变数天之后被苏联送回喀布尔的，而那时，苏联军队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这是事实真相。卡尔迈勒在阿富汗公开露面是在1980年1月2日。

苏联的干涉者们这次也想尽了种种办法，试图为这种明目张胆的军事干涉编造“合法的”根据。阿富汗政变的第二天（12月28日），苏联驻日大使馆的参赞来到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这个“通报”说，27日夜里发生的推翻阿明政权的政变是阿富汗国内的革命势力发动的，苏联军队是根据新政权的要求出动的。

“在阿富汗出现了一支坚决反对阿明政权、推翻阿明政权并建立了党和国家的新领导机构的势力。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担任了党和政府的首脑。……”

“新的国家及其领导人要求苏联提供包括军事在内的政治的和物资的援助。

“苏联决定给以这样的支持。……苏联同意阿富汗政府的请求，在一定期间向那里派驻少量部队。”

12月31日的《真理报》也重复了“通报”的内容（彼得罗夫：《关于阿富汗事件》）。但是，关于政变后建立的卡尔迈勒“新政权”要求发动政变的苏联军队出动的理由，只要历史不倒转就不能成立，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面对日本共产党等的批判，苏联从最初的说明逐步退缩，又说什么应阿明的要求出动的等等，说法变了（如在1980年12

月的日苏两党会谈中)。但是,出动军队侵犯别国的主权,对于自己到底是应谁的要求这么干的这个根本问题,苏联的说明一变再变,直到今天也没能作出首尾一致的说明。这件事本身最雄辩不过地证明了这是苏联搞的、极端非法的侵略行为,阿富汗政权既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同意苏联这么做。

在此有必要引起注意的是,苏联把上面提到的“阿苏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第四条拿出来作为其侵略行动的“法律根据”。这个条约与华沙条约不同,它并没有规定共同防御,仅仅说两个缔约国在有关安全保障的问题上进行“协议”,在“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加强国防力量发展“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但是,对于大国主义者来说,不管规定如何,有关安全保障条款存在本身,就能够成为苏联以“安全保障”为借口,恣意推翻不合自己意的政权的“根据”。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实例,它证明,一旦军事集团政策与大国主义结合到一起,对于各民族的主权和安全就会构成莫大的危险。

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在介绍阿富汗人的抵抗斗争史时写道:“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1857年《阿富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78页)。当时使他痛感到这一点的是英国向阿富汗伸出了侵略魔爪。苏联的干涉主义者在行使武力两年多的今天,在反对占领统治的阿富汗人民斗争面前,陷入了与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侵略者相同的境地。向阿富汗人的独立精神挑战的干涉者,不管投入多少军事力量,要想在阿富汗实现稳定的统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十七 波兰政权的危机及其背景

现在在波兰发生的事态，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同华沙条约结合在一起的大国主义和干涉主义的表现。

波兰人民反对政治当权者们的官僚主义、腐败和缺乏自主性的斗争，仅从表现为群众性斗争来说，也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

1956年，在对斯大林进行了一定程度批判的苏联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和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解散后不久的那个时期，顽固坚持以往方针的波兰党和政府的领导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6月，在经济困难的直接影响下，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日趋高涨。在波兹南这个波兰的西部城市，甚至发生了出动军队的流血惨案。以此为开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内部要求改变现状的气氛也高涨起来。尽管经过一番曲折，在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为解决危机有必要更换领导人这件事成了重要议题。在全体会议即将召开之前，以赫鲁晓夫为团长，包括华沙条约军总司令的大型代表团急忙赶到华沙，要求同波兰方面进行紧急会谈，一时显得很紧张。结果，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奥哈布等以往的当政者宣布下台，一个时期曾以“民族共产主义”罪名被捕入狱的哥穆尔卡担任了第一书记。通过领导人的更换，使危机大致上得到了解决。

哥穆尔卡因斯大林的指示于1948年被赶下台，时隔八年

又重新恢复了党的最高负责人的地位。他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的第一个讲演中强调说，“行使权力的人”失去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信任，就是“失去了执权的道义基础”，要从波兰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消除阻碍发展的一切不好的东西”，仅仅撤换了失去工人阶级信任的人是不够的，有必要对波兰的人民政府的制度、工业组织制度、国家和党的机关活动的所有方面进行大的改革。

哥穆尔卡在同一个讲演中还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还可能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他给想要探索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带来了很大希望。

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新领导刚刚开始掌权，便首先解除了也可以说是苏联霸权主义象征的苏籍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在波兰军队中的职务，放弃了声誉不佳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与教会和解等，实行了给国民带来希望的一系列改革。但是，对这种改革的期待不久便成为过去，哥穆尔卡本身也越来越依赖1956年他曾高声谴责过的、缺乏道义基础的“行使权力”的手法，哥穆尔卡复权时作出的许诺，最终还是没能实行。

十四年后的1970年12月底，政府无视舆论，突然公布生活必需品涨价，在格但斯克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爆发了工人、市民抗议政府这个决定的斗争。哥穆尔卡政府立即宣布这是“反革命”，出动军队，宣布戒严等，以武力进行镇压。抗议的斗争扩展到包括首都华沙在内的其他城市，政权再次陷入了危机。十四年前导致诞生哥穆尔卡政权的波兹南危机在哥穆尔卡政权下，以更大的规模再现了。这次的危机也以哥穆

尔卡下台，政治局委员盖莱克就任第一书记这种更换当政者的形式大致上收场了。

新的领导人盖莱克在第二年，即1971年2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第一次作报告。关于十二月危机的原因，盖莱克说，这是党的政策错误以及指导方法上的官僚主义错误造成的结果。他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对于我国社会制度来说不可缺少的党的领导机构和工人阶级以及城市人民之间的纽带遭到了削弱，甚至遭到了破坏。”他一边回顾列宁关于“威胁行使权力的党的危险”的遗教，一边再次保证要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党和国家之中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他几次谈到波兰民族的爱国主义历史，强调继承“波兰民族的最进步的、民主的传统”，在波兰的政治中发展“民主生活的独自形态”的重要性。

盖莱克的这个许诺实际上同十四年前哥穆尔卡作出的许诺的结果完全相同。下述的事实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1980年以来的动荡中，盖莱克作为导致今天的困难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的罪魁祸首而遭到了谴责，从党的领导机构中被逐了出去。为了从危机中谋求再生，去年7月举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特别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致波兰人民书》中，以如下最激烈的措词谴责了过去执政者们的“罪行”。

“今天的危机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相反，正是因为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脱离了指导工会运动的光辉的思想，才使波兰遭受了苦难。其责任应由身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但是却背叛了他们宣布的观念的人来承担。党正在清除他们，并决心把对犯错误的人的清查

过程进行到底。我们自己尖锐而严厉地指出了给我们、给我们党造成了负担的这些错误和罪过。由此得出结论，党和国家的领导绝不能再脱离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这个支持自己的基础。再也不能容许轻视波兰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劳动。”

二十八 背离民族独立的 历史和传统

群众斗争和政权危机——→更换当政者和保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放弃保证和政权腐败。二十年来，这种过程反反复复地在波兰出现，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呢？

要全面剖析这个问题，恐怕必须历史地分析许多因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反复更换的当政者没有摆脱对大国主义的从属关系，而大国主义则正是导致产生背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最大根源。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在1956年的危机中，作为民族的希望，颇富有戏剧性地重返党的领导岗位的哥穆尔卡也不例外，尽管他曾有过因为主张走“波兰的道路”，提倡自主性，而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被驱逐、投进了监狱的经历。哥穆尔卡最终还是与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站到了最忠实地追随苏联大国主义的立场上。他在1968年军事介入捷克斯洛伐克时也作为最积极的推进者而帮助了苏联，这是确凿的事实。对捷克斯洛伐克党发出最后通牒的7月的华沙条约五国党首脑会议，就是在华

沙，在哥穆尔卡的主持下举行的。

1970年取代哥穆尔卡而上台的盖莱克在追随苏联、依靠苏联大国主义的保护伞这点上，同哥穆尔卡没有什么两样。在1976年修改宪法时规定：“要加强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与合作。”这一条（第六条）再次成为约束波兰的国际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则，把加强同苏联的关系在宪法里规定为义务，似乎可以说，这是盖莱克政权上述姿态的象征。

波兰人民拥有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悠久历史和传统。翻开历史就会看得很清楚，过去，波兰民族曾经是建设了东欧最大国家的民族，可是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国土一直被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波兰人民一直处于自己的国家被掠夺、被压迫的境地。因此，波兰人民在十九世纪，作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旗手，在欧洲的进步和变革的事业中，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从经过来说，是在为加强同波兰人民的团结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诞生的。

马克思在1867年第一国际举行第一次大会时对代表们“指示”说：要达到摧毁居于欧洲统治阶级背后的“黑暗的亚洲强国”（沙皇俄国）的目的，“只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页）就有可能。1875年，在伦敦召开纪念波兰解放斗争集会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分别发去了贺电，恩格斯在贺电中强调了波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整个欧洲的意义，他说：

“我将永远认为，波兰的解放是欧洲无产阶级彻底解

放、特别是其他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基石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把波兰的复兴看作是欧洲工人的“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从事活动的年代与马克思及恩格斯活动的年代的历史形势不同，但是，他也同样毕生坚持了最彻底地拥护波兰民族自决权的立场。正是列宁，当卢森堡等波兰革命家们机械地反对波兰的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由此导致反对波兰独立，想要抛弃要求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时，列宁同他们展开了十分具体的论战，全面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并论证了波兰提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对于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1914年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列宁全集》第20卷）及1916年写的《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中讲得很清楚。用不着说，列宁拥护的、波兰人提出的自决权的要求，首先是针对俄国的沙皇制度的。

列宁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期，谈到过全体波兰人民都“充满了向大莫斯科主义者复仇的思想”的问题，他指出，这是长期以来一直起到了“扼杀波兰自由的刽子手”作用的俄罗斯沙皇制度压迫的产物（1917年4月，在四月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4卷第283页）。列宁展望道：俄国和波兰这两个民族间存在的这种关系，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波兰人会通过实际的经验，认识到把对沙皇制度的憎恨“用来对待社会主义工人和社会主义俄国，那就没有道理”。从而克服憎恨情绪，为争取各民族之间实现“融洽”而开辟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道路。从列宁的这种展望也可以看出，列宁作为俄国

的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波兰问题上一直强调如下见解：“宣传民族分离自由和我们组成政府时坚决实现这种自由。”（1918年《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危机”》，《列宁全集》第23卷第63页）

革命成功后，列宁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首脑，立即承认了波兰的独立。尽管1920年波兰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俄国与波兰的关系经历了种种复杂的曲折，列宁总是十分慎重考虑，注意尊重波兰人民的民族自主性。

但是，斯大林在对波兰的政策上根本不遵循列宁的这个教导，相反，一直实行粗暴的大国主义政策。

我们已经谈到，1939年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重新分割波兰，战争前夜解散波兰共产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过和结果，给苏联同波兰的关系罩上了复杂的阴影。

正因为如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波兰人民追求适合波兰的历史条件的、民族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愿望尤为强烈，这是理所当然的。波兰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在波兰，当执政者违背波兰人民的自主意愿，坚持采取追随大国的立场的时候，在党、政府与人民之间就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尽管反反复复作出许诺，然而当权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也是不可救药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波兰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也生动地证明，大国主义的保护伞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二十九 以“安全保障”为借口 施加压力和进行干涉

无论是1956年还是1970年，波兰发生的事态，从大的方面来说，都是停留在更替当政者和进行口头上的自我批判的地步，顶多是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框框内进行部分改革。苏联领导认为，如果仅仅是这样，那还是能容忍的，因而也就容忍下来了。

但是，1980年以来的波兰工人的斗争，迫使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的保证，签订了一些“协定”，其中包括保障工人的罢工权以及结成团结工会的权利，废除检查制度，确实扩大民主和自由。这是波兰工人阶级和人民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比1956年和1970年的抗议斗争更前进了一步，发展到了自觉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阶段的成果。当然其中也有对社会主义本身持批判和反对立场的势力的挑动。但是，如果党和政府忠实地实行许诺的改革，认真地恢复在人民中的威信，那么就可能在人民的支持下，为波兰走上社会主义自主和民主的发展道路开辟新的局面，而且这种可能性是能够变成现实的。

在1980年9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盖莱克下台，成立了以卡尼亚为第一书记的新领导体制，当时，新领导班子表示要基本上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可是，苏联领导人认为，波兰这次的危机与以往不同，那里正在出现超出自己强加给他的苏联式社会主义框框的实质

性改革。并且很快就在11月的《真理报》等报刊上开始把波兰的改革运动和团结工会称之为“反革命”，这种腔调中有让人们想起十二年前捷克斯诺伐克事件教训的味道。12月5日，华沙条约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议在莫斯科举行，重点讨论了波兰形势。这等于威胁说，如果波兰的改革向不合苏联意愿的方向发展，那么就将与当时捷克事件一样，在“保障安全”的名义下进行军事干涉，以阻止这种改革。召开这种会议也是一种要求和示威，即如果不愿让苏联进行军事干涉，那就要按苏联说的去办，把民主的改革运动当作“反革命”加以镇压。从十二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来看，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1980年夏季罢工斗争以来波兰出现的问题，无论是保障罢工权及结成团结工会权的问题，还是有关其他各种制度的改革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波兰国内的问题，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其是非应由波兰人民自己作出判断，即使其内容和方向不合苏联领导的意，波兰人民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也没有从外部干涉的权利。但是苏联却硬要把它同华沙条约各国的整个“安全”联系起来，施加国际压力；另一方面，为使军事干涉合法化而事先埋下伏笔，苏联等国展开宣传攻势的着眼点就在这里。在波兰问题上，华沙条约组织和军事集团也很快地露出了干涉主义工具的面目。

对始于夏季罢工斗争的波兰事态，日本共产党很早便给以高度评价，认为通过工人阶级和群众的斗争，“开辟了包括进行一定程度的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局面”，并反复警告说，这种制度的改革，始终是波兰国内的问题，即使改革的内容不合某些人的意，也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进

行干涉的借口。

苏联领导人从1981年起，不断地以“安全”为借口，进行干涉性恫吓。但是，当他们看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又公然采取新的干涉手段，指责波兰党的领导是什么“修正主义”，进而又组织盲目追随苏联的反党宗派，企图颠覆“修正主义”的领导机构。

1981年7月的特别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5月15日，在波兰的一个地方城市——卡托维兹，由称作“卡托维兹论坛”的一部分党员组织了集会，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和决议。这些宣言和决议说，由于党的领导的错误，波兰“已经面临无政府状态和反革命的威胁”，并强调把波兰的事态毫无保留地告诉苏联以及社会主义的兄弟党，这是波兰党的国际责任。宣言和决议引证苏联一伙对波兰形势的分析，说什么波兰事态已经成了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国际问题，用“同修正主义势力妥协”和“瓦解了党的各级组织”的罪名来指责党的领导。“卡托维兹论坛”的宣言和决议对特别党代表大会召开的目的是和结果也表明了“怀疑”的态度。

苏联领导立即在《真理报》上刊登“卡托维兹论坛”的宣言和决议，采取了事实上把这股反对势力当作“真正共产主义者”加以支持的态度。接着，《真理报》于6月12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波兰共产党的公开信。公开信首先谴责说，波兰党的领导一再向反革命势力让步、妥协，“波兰的形势不仅危险，而且已濒于危机的边缘”。对正在准备的特别代表大会代表的组成也不顾事实地攻击，说“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的数目太少”，“机会主义者把自己需要的人物派进了大

会”。公开信还强调，波兰对“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承担着“义务”，并且恫吓说，如果不改变路线就将进行干涉。公开信还说，在波兰党内“有许多忠诚而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准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和独立的波兰进行实际的斗争”。公开信公然表明支持反对党的领导机构的反对势力——以“卡托维兹论坛”为代表的追随苏联的宗派势力。

支持、扶植反党宗派主义，并借此介入其他党的内部事务的作法，与1964年苏联对日本共产党采取的作法完全同出一辙。日本共产党在6月举行的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以大会的名义，致电苏联，表示抗议其新的干涉行动，同时也致电波兰党表示支持和鼓励，鼓励他们为抵抗干涉，“维护波兰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发展社会主义波兰”而斗争。

三十 秉承苏联旨意的军事政权

1981年7月，特别党代表大会按预定计划召开，此后，苏联改变了干涉的策略，开始向波兰党的领导机构施加压力，使其变成按苏联的要求办事的领导机构。苏联的压力使波兰党大大丧失了自主性。这一点从下述事实也可明显地看出来：大会结束后不久，波兰党的领导机构对日本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例如不允许《赤旗报》特派记者常驻波兰；波兰共产党机关报开始刊登苏共中央谴责日本共产党的信件（尽管刊登的只是一部分内容）。总之开始表示效忠苏联。

但是，这种使用一般的压力，一点点地让波兰党转变方向的作法并不能达到苏联的目的。为了把1980年秋季以来的“协定”以及党中央的决议，特别是特别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全部推翻，把波兰再一次紧紧地拴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枷锁上，有必要对波兰采取不亚于1968年军事介入捷克斯洛伐克的那种非常手段。

那就是12月13日由雅鲁泽尔斯基发动的军事政变和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武力行动。

当日本共产党得知波兰发生军事政变后，立即发表了国际委员会负责人西泽富夫的谈话(12月14日)，表明看法，指出，波兰的事态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容忍的“荒谬绝伦的事态”。

“13日上午，由雅鲁泽尔斯基总理宣布在波兰实行戒严，由‘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全部权力。在‘救国军事委员会’当天发表的公告中公布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停止威胁国家的所有工会和组织的活动，学校停课，除党和军队的机关报之外，禁止发行其他任何报纸，等等。另外，还逮捕了许多工会干部。

“在解放三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荒谬绝伦，令人触目惊心。”

发动政变的人们拿出宪法条款来为他们的暴行辩解，可是掌握了全部权力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本身就是宪法上并不存在的军事专政机构。雅鲁泽尔斯基自己在政变当天发表讲话说，“救国军事委员会并不是取代宪法上规定的各种国家机构”。这说明他自己也承认“救国军事委员会”是不符合宪法

规定的。很显然，这个军事政权根本就没有谈论宪法的资格。

另外从最近我们得到的“法令”来看，在戒严令下实行的镇压，并不仅仅是针对特定的运动和团体的，而且也是针对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当局公然宣布，未经许可，不准举行包括体育和娱乐活动在内的任何群众集会，禁止利用印刷手段，对信件要实行检查，对电话实行窃听。限制迁移的自由，对十五岁以上的市民实行义务劳动制，强制农民提供农产品等，市民生活被置于军政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进而还公布采取“预防性拘留”体制，对十七岁以上有“活动自由”而又有参与威胁国家安全活动的“嫌疑”的市民，可以送“隔离中心”对他实行拘留。这种事态不禁让人想起日本处于军国主义时代的黑暗状况。

一举剥夺了波兰人民的权利，把人民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的这次军事政变，正如雅鲁泽尔斯基的布告及演说表明的那样，其最大的借口是：因为有发生“内战”的危险，所以要保卫国家的安全。军政当局不断强调说：“加强波兰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波兰国家的不可动摇的立场。”

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议论：雅鲁泽尔斯基通过颁布戒严令，防止了估计苏联可能实行的军事介入。应该说这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是一种忽略了事物本质的说法。雅鲁泽尔斯基发动的军事政变，肯定是基于与苏联相同的对形势的判断，受到了苏联的支持。新建立的名为“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政权，代替苏联，全面做了前年以来苏联在华沙条约国共同“安全”的名义下要求办的事情。

从波兰1980年夏天开展罢工斗争和缔结政府与工会间的协议开始，苏联就把民主改革和民主运动看作是威胁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行动，要求波兰当局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镇压和粉碎。军事政权在戒严令下实施的正是苏联干涉者提出的政策和方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干涉者和雅鲁泽尔斯基之间的情况，同1968年向苏联军事介入投降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苏军占领下实行苏联要求的政策的情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所不同的只是程序。在发生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开始是由苏联等五国军队发动军事进攻和军事政变，其后改变政权性质，更换人马；而波兰的情况是，最初是苏联施加压力，在10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让雅鲁泽尔斯基取代卡尼亚担任党的第一书记，一边欺骗党和人民，一边把军事政变的执行者事先推到党和政府的最高负责人的地位上去，然后一下子推翻党和政府过去作出的全部决定，由上而下地强行发动军事政变，把全体波兰人民置于权力无限的军事政权的控制之下。

这个过程证明：1968年军事介入捷克斯洛伐克和1981年在波兰实行军事独裁，只不过是苏联实行大国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种手法而已。而且，这两个事件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苏联领导人借口维护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安全”，排除一切试图摆脱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认真尝试和寻求真正自主的行动。从斯大林时代起，苏联领导人就一直采取这种手法。多年来，这种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

三十一 苏联垄断总编辑一职 达二十四年之久

在谈斯大林的继承人的大国主义的时候，不能不谈到今天存在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唯一的国际组织——《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社的问题。

这个杂志是1958年9月创刊的，编辑部由各国共产党的代表组成，设在布拉格。去年12月，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吁请各国废除这个杂志，并解散其编辑部。这是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杂志社完全背离了二十四年前创刊的宗旨，蜕变成了苏联对外路线的“一家宣传机构”，特别是在侵略阿富汗事件发生之后，这种倾向变得更严重了。

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历史上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从很早以前开始，各国共产党便从独立平等的立场出发，反对以苏联为中心的大国主义倾向，坚持自主。

1958年3月7日和8日在布拉格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决定创办《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但是，这次会议召集的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而且态度不明朗。一年前即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但是，《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创刊问题并没有在各国党参加的这次国际会议上提出来，而是在过了两个多月以后的1958年1月底，由苏联共产党致函它选择的二十二个党，提议由这些党举行会议，讨论创刊国际性的

合办杂志的问题。问题的提起就是这样的。

在被邀请的党中，南斯拉夫党表示不参加，巴西党缺席，结果在3月7日到达布拉格的共有二十个国家的党：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欧洲的六个党（奥地利、英国、西德、意大利、芬兰、法国），亚洲的印度共产党，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共产党。

这次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解散后的形势下，为了彼此交流工作经验和互通情报，将创刊一种由各国共产党联合编辑的新杂志，杂志取名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设在布拉格。

如上所述，只由苏联指定的一部分党举行的会议决定创办国际性杂志并设立其编辑部的做法是不民主的。不过，会议通过的“决议”阐明了几个重要的原则问题，保证今后要民主办杂志。

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地说《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机关”刊物。

“这个杂志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机关。它是……各兄弟党之间交换经验的国际讲坛。”

这是公开保证不再重复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杂志《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站在各国共产党之上，成为斯大林和苏联领导机构的“发号施令机关”的错误。

另一点是“决议”承认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只要愿意，就可以以与参加创办会议的各个党“对等的条件”加入这个杂志并参与其编辑工作。

“所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兄弟党，可以以平等的条

件加入创立本杂志的党的行列，也可以采取适合本党情况的任何形式参加本杂志的发行和出版工作。”

但是，随着苏联领导机构越来越公开地奉行大国主义，这些民主原则事实上又成了一纸空文。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编辑委员会的构成吧。在二十四年中，苏联共产党完全垄断了总编辑的职位：第一任是鲁勉采夫、第二任是弗兰采夫、第三任是扎罗多夫（现任）。

在批判斯大林制订结成苏维埃联邦计划中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时（请参见本书第五章），列宁曾致函政治局（1922年10月），极力强调确立轮流担任主席制是“绝对”必要的。他说：

“在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绝对坚持由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

绝对坚持！”（《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给政治局的便笺》，

《列宁全集》第33卷334页）

这是因为列宁知道，即使将结成苏维埃联邦的条约的条款改成民主的条款，但是如果在实际执行中允许俄罗斯人垄断主席等职位，那么任何民主的条款最后都会成为大国沙文主义的牺牲品。

按照列宁的这一观点来看，苏联领导机构的态度恰恰是大国主义的“绝对”暴露。苏联领导在以各党的平等和权利均等为原则而设立的国际机构中垄断总编辑的职位达二十四年之久，并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记录，那就是中国代表

团的刘宁一在1958年召开的创刊会议上提议“选举苏联共产党代表担任总编辑”。在这次会议成立“决议”起草委员会时，提议由苏联的波诺马廖夫负责的也是中国代表团的刘宁一。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当时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团结，就得有个头”，于是它利用一切机会拼命鼓吹团结要以苏联为中心，倡议以苏联为主来办杂志。但是，时隔不久，中苏之间发生了论战，接着中国代表就撤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

三十二 站在反党分子一边

在编辑委员会的整个构成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设立编辑委员会的“决议”曾保证给后来参加的党以“对等的条件”，但是，编辑委员会在长期内却只是由设立时选定的那十二个党组成。日本共产党是从1959年向布拉格的编辑部派常驻代表（第一任是书记处书记米源昶），早就投寄党领导机构的文章，并遵循创刊的宗旨为杂志的发展积极地进行了工作，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够参加编辑委员会，而只是加入了对编辑不负直接责任的理事会。

1974年举行各党代表会议时，日本共产党代表（政治局常委金子满广）对编辑委员会的构成十五年一成不变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建议考虑地区平衡问题（当时的构成情况是，亚洲只有以苏联派著称的印度的丹吉派参加），“按民主原则组成，以便公正地反映事实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但是，苏联等国对于这个建议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只是用从亚洲吸收蒙古党和

伊拉克党的做法在形式上增加了亚洲的比重，而丝毫不想改变排挤日本共产党的政策。

垄断总编辑以及编辑部的重要职位，使编辑委员会的构成长期处于便于自己控制的状态——这清楚地暴露出苏联领导实际要把这个国际机构变成自己奉行大国主义的工具的意图，尽管它表面上高唱各党对等和权利均等。

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编辑方面出现苏联大国主义的影子是从苏联共产党在1961年秋天单方面谴责阿尔巴尼亚和1962年年底单方面谴责中国开始的。苏联领导机构企图把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卷入这次论战中，结果这个杂志便不顾设立的宗旨，单方面刊登了谴责这些党的文章。其中甚至有以“不署名文章”的形式发表的、据认为是表明编辑部这个国际机构的看法的文章。这次谴责运动是该杂志堕落为苏联的对外政策的“宣传机构”的第一步。

日本共产党强烈抗议把这个杂志作为共产党之间论战的单方面的宣传工具，并建议编辑部不要刊登谴责其他党的文章。与此同时，还在1962年采取措施改变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在日本国内的发行办法，即把过去发行“日文版”（全部翻译）的方式改为遵照创刊的原则对文章经过选择后单独发行“日本版”的方式。

日本共产党就是这样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公开采取以苏联为中心的大国主义的编辑方针的最初时期开始，最顽强地进行原则斗争，反对《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蜕化变质为大国主义的刊物的。

1964年，苏联领导机构利用志贺等反党分子开始干涉日本共产党。当日苏两党围绕这次干涉发生争论时，《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站在干涉者方面，对日本共产党的工作进行了无理的阻挠。就是说，日本共产党寄去选举对策部长市川正一关于1965年的参议院选举的文章时，编辑部制造种种借口，坚持拒绝刊载近两年之久。拒绝刊载的真正原因在于文章谈到了在参议院与志贺一派的斗争（他在东京地方选区宣布参加竞选，试图使野坂参三主席落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7年6月，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是政治局委员西泽富夫）同《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在布拉格举行了会谈。苏联共产党的索波列夫代表编辑部参加了这次会谈。他在会谈时称呼反党分子志贺为“志贺同志”，宣称即使被日本共产党开除了，“我们也不会改变对志贺的尊敬”，“人类的大多数站在志贺一边”。对此，日本方面提出了严重抗议，于是索波列夫惊慌失措，赶紧改口说这是“个人看法”，接着便撤销了他的讲话。随后，总编辑弗兰采夫又再次要求举行会谈，正式撤销了索波列夫的讲话。但是，这件事无意中暴露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是与苏联干涉者一起站在“志贺一边”的。

由于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原则的顽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编辑部的阻挠，《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在1967年12月一期上刊登了市川的文章。这篇稿子从寄出到登出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进行了另一次选举（1967年1月举行的大选），因此要总结这两次选举就需要对文章作若干补充。不过，试图使苏联的干涉主义合法化的阴谋终于破产了，

各国党的“共同刊物”不得不刊登断定志贺等人是反党分裂主义分子的文章。这个胜利，在反对干涉主义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上所述，在日苏两党的争论问题上，《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尽管不得不进行一定的后退，但是，它蜕变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宣传机构”的倾向，总的来说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等五国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军事进攻，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和政府，占领捷克时，这种倾向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所在的建筑物受到了苏军坦克的“警卫”，然而，《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却企图把这个杂志迫认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同谋犯”。其表现就是编辑部曾提议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军事干涉前于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会议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苏联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领导投降并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次莫斯科谈判”的联合公报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委员会被迫接受这一联合公报作出的“决议”，全部刊登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

日本共产党的常驻代表(中央委员沼田秀乡)针锋相对地反对了这一建议。他指出，“如果刊登这些文件，读者就会认为编辑部是全面同意这次军事行动的全过程。坚决不能采取这种‘共同承担责任’的做法。”不少西欧国家的党的代表也同样发表了反对意见，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既然是国际性的报导消息的杂志，那么如果要刊登肯定军事干涉的文件，也应该一并刊登各党反对苏联军事干涉的文件。但是，编辑部弄虚作假，谎称是什么“参考文件”，按预定计划刊载了文件，

但却没有刊登反对军事干涉的党的文件。当时尽管没有刊登从正面论述并拥护军事干涉的文章，但是，自那以后，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只是刊登干涉者和投降干涉者的看法。这恰好说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了干涉者的宣传机构。

日本共产党在那以后，每当举行《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各党代表会议（1969年、1974年和1977年）就具体地批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编辑和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一再呼吁重新回到创刊时确定的原则，对编辑部的构成和工作实行民主改革，然而由苏联控制实权的编辑部却支支吾吾，不肯采纳。

三十三 蜕变成苏联对外路线 的“宣传机构”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蜕变成苏联对外政策的“宣传机构”的倾向，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几乎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文章，赞扬苏联的对外政策，说什么是具有“人类”的意义的政策。不仅如此，自进行干涉后不久便美化入侵阿富汗的军事干涉行动是什么正义行动，其全部编辑工作都是立足于这种立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计划在1980年4月一期上发表上述一类文章，日本共产党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不能同意”，但是编辑部却不予理睬，刊登了傀儡政权头子卡尔迈勒对记

者的谈话，接着又在第二年1981年6月号上刊登了卡尔迈勒写的文章。

众所周知，在参加《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党中，反对苏联军事入侵阿富汗的不只日本共产党，还有不少党，其中包括意大利、英国等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党。但是，《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在其刊物上根本没有介绍这些党的看法，而是片面地站在干涉者的立场上，利用在军事干涉中诞生的傀儡政权的代表来发挥使军事干涉“合法化”的可耻的作用。这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社编辑部采取的态度更加露骨、更加厚颜无耻。

卡尔迈勒等人虽然声称是苏联军队用军事政变摧毁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但是，人民民主党在塔拉基时代和阿明时代既没有参加过《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活动，也没有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看一下这种情况，就会更加明白让卡尔迈勒等人在杂志上为苏联的军事干涉进行辩解的做法是多么无法无天。

另一方面，又以强调“编辑方针”或者“出版计划”的形式，企图把《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办成谴责中国共产党、美化苏联（打的招牌是“同反苏主义进行斗争”），进行苏联领导所希望的国际宣传的“论坛”。这已经开始成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正式指导方针。

形势越来越表明，正在重复斯大林把共产党情报局变为苏联大国主义的工具的错误。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80年12月27日致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社，要求纠正该杂志的编

辑方针，彻底地改变编辑部的构成。这封信在第二年1981年1月6日由驻布拉格代表转交给编辑部。对此，总编辑扎罗多夫匆忙地在1月8日便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写回信，拒绝了日本的建议。这封回信并未经过全体编委开会讨论，而只是表明了几个特定成员的意见，随便按上了“编辑委员会”的名义。这种做法也清楚地表现出了大国主义者在垄断总编辑以及编辑部的重要职务后把编辑部事实上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的那种思想方法和行动方式。

日本共产党在2月5日再次致函编辑部。对此编辑部给予了口头“回答”。我们在6月18日和9月25日又发出了第三封和第四封信。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起卑劣的事件，即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欺诈的手法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攻击。

在布拉格发行《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出版社。这家出版社还出版一种名叫《新闻公报》的刊物。这本叫《新闻公报》的刊物在1981年第八期上刊登了卡尔迈勒的“党”点名攻击日本共产党的文章。日本共产党在第三封信中对此提出了抗议，要求行使理所当然的权利，在《新闻公报》上刊登日本共产党的反驳文章。编辑部便托词《新闻公报》不归编辑部管而逃避责任，然而欺诈手法正是表现在这一点上。《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出版社（社长萨契柯夫是苏联人，他当然要接受编辑委员会的监督）出版两种刊物，那些攻击其他党而又不能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就被刊登到《新闻公报》上，对某个党打冷枪放暗箭，进行出其不意的攻击。当那个党提出抗议时，便抛出事先准备好的遁辞——对那个刊物我们无权过问。这种花招，

人们不难看穿。

日本共产党在给编辑部的正式信件中，遵照创刊时的原则一再建议《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及其编辑部对其工作、机构和管理实行民主改革。然而，编辑部当局从一开始便采取了不接受意见的态度。但是，自那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那些问题应该提交各党代表会议讨论。

于是在1981年11月24日至27日举行了参加《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各党代表会议。日本共产党派出以副委员长西泽富夫为团长的大型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全面地指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活动和领导已经变成特定党的御用工具，陷入极其危险的状态，并提议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在讨论过程中，日本党是被提到的最多的党（无论赞成一方或者反对一方都提到日本党）。象这种情况所表明的，日本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事实上成了代表会议争论的最大焦点。

但是，苏联领导机构和编辑部在这次会议上也根本不想研究日本共产党及其他党提出来的主张改革的建议，而是以模棱两可的态度加以拒绝，但在另一方面，却在正式的编辑委员会之外，设立由苏联总编辑指挥的“国际书记处”，进一步加强了可以凭借多数票强行推行苏联对外政策的机构。

不仅如此，在这次会议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苏联共产党和编辑当局独断专行，邀请苏联干涉的私生子卡尔迈勒的“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澳大利亚的“志贺派”（“澳大利亚社会党”）。这种肆无忌惮的行动简直达到了旁若无人的程度。

日本共产党在这次会议后听取了代表团的回国报告，总结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创刊以来二十四年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了严肃的结论，认为这个杂志已经变质，现在已同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一样，成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害的”东西。日本共产党在12月10日发表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声明。声明说：

“这次代表会议的经过和结果表明，这个杂志已经完全背离了其创刊的宗旨，成了为苏联的霸权主义的对外路线树碑立传为其中心任务的刊物，而且在‘同反苏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名义下，日益变本加厉地排斥一切不同意见。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这个杂志，从站在独立平等的立场上的各国共产党根据共同一致的任务来维护发展国际团结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基本立场来看，显然是有害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停办这个杂志并解散其编辑部。我们只好作出这种判断。”

日本共产党的这一决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将在今后反对苏联大国主义的国际斗争中越来越得到证明。

三十四 铲除大国主义的 国际意义（上）

斯大林逝世已经二十九年，可是苏联领导机构今天采取的政策和行动仍然继续着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

此，我们再概括地看一下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的大国主义的主要表现。

第一，苏联领导机构自1956年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在口头上宣布承认“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但是事实上是不准许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脱离“苏联式”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路。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指出，苏联领导机构顽固坚持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并不是过去列宁所追求的、结合俄国的历史情况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原则——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式的道路，而是与其风马牛不相及的。列宁发展的道路，是适合俄国的具体情况的道路，不仅限于民族问题，在基本立场上也是富有科学性和革命创造性的。在这方面，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今天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里，不仅包括苏联在各种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经验，还包括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犯下的许多错误和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的东西。这一切都被统统地当作社会主义的样板了。

另外，不管苏联是借口根据党和政府的决定也好，还是借口根据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也好，总之，凡是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和方针，就要进行军事干涉，就要发动军事政变，拼凑苏联所希望的政权，让它执行符合苏联心愿的政策，这就是苏联行动的“准则”。这种行动准则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1981年在波兰已经得到了证实。苏联为了使其干涉合法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华沙条约。

他们对于自己随意划入其“势力范围”的国家，象在阿富汗表现的那样，即使那个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援用其行

动“准则”。斯大林过去尽管那样集中力量谴责南斯拉夫，但始终没有采取军事干涉行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今天苏联领导机构蹂躏其他国家的民族自决权的干涉行动，比斯大林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列宁说斯大林等人在格鲁吉亚的行动是“帝国主义的态度”的表现。那么，苏联对阿富汗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干涉，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帝国主义”了。

第二，苏联借口“共同防御”侵略，组织军事集团，但又把这种集团作为干涉其他国家的工具，实行霸权主义。苏联的这种政策和美国为主推行的旨在进行战争和侵略的军事集团政策，再次向全世界各国人民证明，军事集团政策对于世界和平与民族自决是有害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谈论世界政治的前景和目标的时候，苏联认为当前军事集团相互对抗的现状是理所当然的，它以前提出的“取消军事集团”的任务已经被逐步抛在了一边。实际上，1971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六大纲领性任务的第二项提出了“同时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解散其军事机构”，在第四项提出了取消一切外国军事基地，但是在1976年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和1981年第二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和平纲领》中，却完全取消了这些任务。以前提出的第三个任务——禁止核武器的任务也被维持美苏核均势和推进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这些力争实现核均势的任务所代替。在这里反映出了大国主义者们的内心想法。他们谋求使大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有利于自己，信奉错误的军事均衡论（这只不过是“实力政策”

论的一种变种)，同时希望军事集团长期存在下去，以便用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日本共产党在批评苏联对外政策上的这种错误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日本将来的问题，明确声明，将来，日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绝对不加入军事集团。

“关于日本的独立和中立的前景，我们党主张，将来日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不加入任何军事同盟，而要继续采取要求解散一切军事同盟和建立真正的集体安全保障的立场。”（引自1969年10月14日发表的政治局声明《事情发生决定“长期延长”安全条约时，呼吁开展全民斗争，争取废除安全条约，建立独立、和平、中立的日本！》）

第三，在领土问题上也存在着大国主义。苏联领导机构强词夺理地声称千岛群岛、齿舞、色丹早已确定为苏联的领土，并为此篡改幕府末期以来日俄、日苏谈判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充分地表现出他们是斯大林推行大国主义扩张领土政策的继承人。对于1959年与日本共产党达成的将来归还南千岛问题的协议，也是在实际的政策和行动上极尽背离之能事，而且他们一直采取回避谈判领土问题的态度。

对于两党之间正式达成的协议，也在其以后的言行中任意撕毁，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这在最近两党举行的关于领土谈判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1979年12月，日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首脑会谈。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宫本明确表示，根据双方协议划定边界，解决领土问题应成为日苏和平条约的重要内容。接着，他建议两党就缔结和平条约问题继续进行协商。对此苏联方面也没有提

出异议，于是关于继续协商和平条约问题便按建议的内容写入了《联合声明》。

但是，在这次两党首脑会谈及其《联合声明》发表后不到一年，苏联领导机构便开始向日本共产党说“日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由于这种极其不老实的态度，便使日苏两党首脑会谈曾经花费了最多的时间讨论的领土问题及其结果事实上付诸东流了。

第四，苏联领导机构现在又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中恢复了斯大林把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作为苏联推行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工具的做法。1958年，作为“交流经验的国际论坛”并明确宣布“不是发号施令机关”而创办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直被苏联共产党控制着编辑部总编辑等主要职务，今天它已蜕化变质，成了主要为苏联霸权主义的对外路线吹喇叭的“单方面的宣传机构”。

三十五 铲除大国主义的 国际意义（下）

第五，苏联领导为了把其他党置于它的霸权之下，屡屡采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容许的非法手段，破坏其他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反党派别。1964年，对我们党进行了反党分裂活动，发起了进攻，但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原则斗争，终于被迫在十五年后的1979年公开承认了错误。然而，苏联领导机构至今仍在世界许多地方攻击和分裂其他党。在欧洲，主要

由于苏联的干涉而分裂的党不在少数。例如，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发生了苏联追随派分裂党的活动；1977年，这个亲苏派分裂了出去，成立了自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新党。瑞典的“志贺派”在1979年的国会选举中遭到了惨败，但是，苏联共产党却仍然与这个反党分裂派组织保持着正式关系，不想掩饰与它们的“同志”式的关系。

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在企图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时，让这些亲苏派直接扮演内奸。这种情况，在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和波兰等国表现的形式都是一样的，尽管程度大小有所不同。

列宁在批判大国主义时对“社会帝国主义者”下了这样的定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借用列宁的说法，那就是：口头上喊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却在其他党的内部组织私通苏联的分裂集团，并利用这些集团把其他国家的运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于这种做法，可以称作挂着共产主义运动招牌的“新殖民主义”——社会殖民主义。这种“社会殖民主义”的手法，仍然是今天苏联领导机构最大量最常用的大国主义的控制手段。

第六，苏联领导机构现在又在重犯斯大林过去犯过的错误。斯大林在1939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曾把苏联的外交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引起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从1963年以后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苏接近”的路线强加于人，到今天把支持其介入阿富汗的路线以及名曰“和平纲领”

的军事力量均衡论引进世界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等等做法，纯粹是斯大林的大国主义的翻版。斯大林曾经说，对苏联的态度是考验一个党有无国际主义的试金石。他要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无条件地支持苏联的外交。

这种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当代世界争取和平、民族自决和社会进步的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关于这一点，通过波兰和阿富汗问题，通过日共同赫鲁晓夫以来对日本革命运动的干涉进行的斗争和要求归还千岛问题，通过对在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问题上散布的军事力量均衡论的批判斗争，我们了解得越来越清楚了。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是我们党最近二十年来一直努力进行的国际活动的重点工作之一。

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从此，帝国主义统治全球的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在人类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走向新时代的前景，这在世界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地球上取得了与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同时并存的地位，并且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恐怕世界民主力量就不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象越南战争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政策的后退和失败，殖民制度在全世界的崩溃，都是在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帝国主义的统治地盘进一步缩小的条件下发生的。从大局来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多数国家是从经济落后的情况开

始建设的，但是，如果将它们今天取得的成就同原来它们本国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封建主义社会时的情况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了解，它们在国民生活的许多方面，实现了过去不能设想的巨大进步和变革，并为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佐证。

当然，正如日本共产党早就指出的那样，总的来说，今天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摆脱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开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从世界史上来说还处于“初创时期”，还没有能够全面表现出社会主义本来的性质，也没有能够全面发挥其胜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但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这种历史性的限制更严重的是，苏联等国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及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各种错误，严重地削弱了社会主义事业本来所具有的政治威信、道义威信和优越性。这种将“苏联式社会主义”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大国主义做法，是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造成经济和政治困难的最大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展克服大国主义的斗争，对于世界和日本的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我们在这篇连载文章的开头重温了列宁的教导。列宁在六十年前严重地警告说，如果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放任不管，就会对我们整个国际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列宁还宣布要同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

虽然列宁提出了警告，但是斯大林的这种大国主义并未被克服，相反在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这种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斯大林逝世后虽然

几经曲折，但基本上一直是飞速发展的。今天的苏联领导机构继承了这种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一再不顾全世界舆论的反对，制造破坏社会主义原则的各种事件。

六十年前列宁宣布的“同大国主义进行决死战”的任务并未完成。今天争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中清除一切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老子党的思想的斗争，是那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历史意义。

我们党在1981年9月在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根据事实，具体列举了苏联现在的政策和行动中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种种表现，并给予了严厉批判。同时还表明了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彻底清除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斗争到底！我们在那封信中说：

“我们党确信，要实现真正的国际团结，只有从世界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彻底清除那种错误的潮流。

“我们党今后将一如既往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反对日本反动统治阶层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并与它结成同盟关系的危险阴谋活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我们党也要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各种表现，要求纠正这些错误，为维护世界和平，完全尊重民族自决，为争取社会进步事业和真正国际主义事业的前进而竭尽全力进行奋斗！”

我们党走的这条道是真正维护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原则的康庄大道。可以说，列宁逝世以来的六十年的历史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